



这张图片是我在2006年拍摄的位于胜利街169号的怡和洋行住宅旧址，现在已经是很火的网红打卡地了。胜利街是汉口老城区比较重要的一条街道，贯穿原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1946年命名为胜利街。这段租界历史的存在，对于汉口的经济文化发展以及社会传统风俗习惯都有着很大的影响。街道上的每一栋建筑都沉淀着岁月的痕迹，默默诉说着那段难忘的历史。我以人文摄影近40年的经验体会到：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要同时兼顾传承和发展，拆迁与新建都要精细规划，“修旧如旧”不能简单化，特别是那些被“腾退”后修复一新的老里份，失去了原居民生活的烟火气后，传统文化的魅力也逐渐消退。拆除老建筑，搞所谓的“仿古建筑”，留给后代的只能是一些失落城市记忆与文化底蕴的赝品。

(摄影 / 撰文 黎德利)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熊少明
董菲 杨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张智勇 陈胜利
陈红英 林伟 徐莉 潘红莲
燕来宾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章旷怡

编辑：许濛 刘玮

封面设计：王鹏

时代年轮



- 4 1974，武钢引进“一米七” / 钟钢
13 华中工学院助跑武钢“一米七” / 陈泽宇 夏增民

风雨同舟



- 19 我的参政议政“情结” / 陶志阳

九城同心



- 24 红色“徐家军”（下） / 刘祖书 徐光思

委员天地



- 30 一份政协提案，预警98年特大洪水 / 刘予伟
34 做社会治理的法治护航者 / 陈昊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商聚汉皋



- 38 做心脏守护者，为生命创可能
/ 陈 松（口述） 闻 夕（整理）

人物春秋



- 43 我的老师陈潭秋琐忆 / 江定仙
46 中共中央机关在武汉时的邓中夏 / 杨 波 杨 军

都市史话



- 50 从黄陂大桥到双凤大桥 / 程竹怀
53 从汉阳造币厂到琴台美术馆 / 刘宝森

史海钩沉



- 57 集家嘴的划子播倒荡 / 田联申

往事漫忆



- 61 那个传说蛮多的“猫子”老师 / 周希正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whzxwszl@163.com

1974，武钢引进“一米七”

◇ 钟 钢

轮印：1974年9月7日，我国引进的一米七轧机工程在武钢开工兴建。投产后生产的“六板一片”，打破高端产品依赖进口的局面，为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50年来，“一米七”不断发展，一开中国工业运用计算机管理实现自动化的先河，创造钢铁工业“引进—消化—创新—提高”的范例。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尽管国民经济发展面对长期封锁，仍在不失时机寻求机会，努力打开西方的大门。

1974年9月7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全国：我国引进的一米七轧机工程在

武钢动工兴建，一条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现代化轧钢生产线将在武汉诞生。

一米七轧机是一项系统工程，主体为“三厂一车间”——热轧带钢厂、冷轧薄板厂、冷轧硅钢片厂、连铸车间，成套设备和生产技术来自联邦德国（常称西德）和日本，总概算约40亿元（其中引进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2.28亿元）。

“一米七”指轧钢机的轧辊有效长度为1700毫米，生产的钢板最大宽度为1550毫米，产品为“六板一片”（汽车板、自行车带钢、镀锌板、镀锡板、船板、普通板和硅钢片），广泛用于我国汽车、船舶、石油化工、轻工业和国防工业。有的产品与当时民生紧



“一米七”工程开工平整场地

密相关，如表面光亮如镜、厚度仅0.2毫米的镀锡板，可用于各种罐头盒制造。此前，这样的镀锡板全靠进口，因从澳门（英文名称 Macao）进入内地，所以俗称“马口铁”。

引进：源于优先民生“吃穿用”

引进“一米七”始于1961年，我国经济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党中央体察民情，着手优先解决民生“吃穿用”问题。

1962年下半年，引进成套设备生产生活物资提上日程。国务院各部委频频派专家出国，摸清先进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状况，准备提出“一揽子”计划。10月，决定成立化纤和化肥两个引进小组，随后与日本、英国等签订引进合同。

新中国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口成套设备，迈出第一步。

1965年，国务院成立新技术引进小组，拟引进约50个项目，包括石油、电子、冶金等行业，一米七轧机名列其中，已与西德西马克公司达成初步意向，但由于外交和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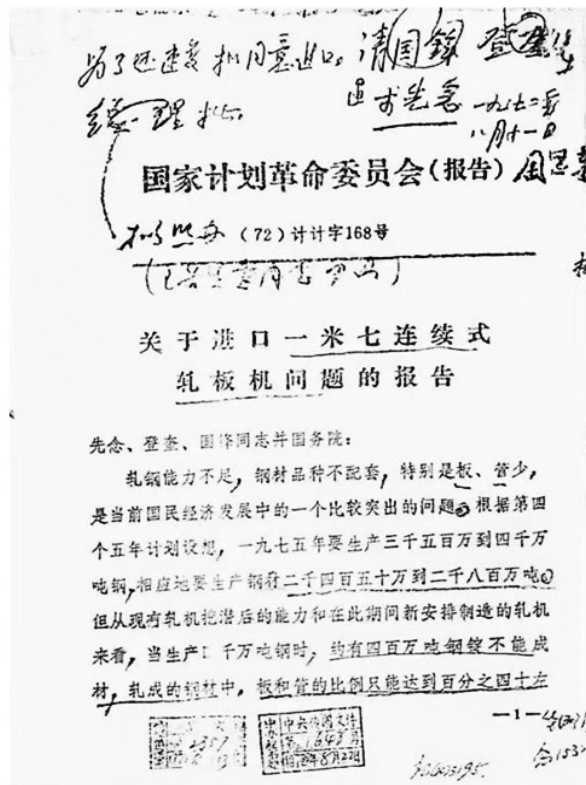
治方面原因“暂缓”签订。

转机来自于毛泽东主席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巨大差距有了清醒认识。

1972年8月，国家计委关于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报告呈报党中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作了批示，毛泽东主席圈阅决定：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包括13套大型化肥设备、4套大型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和一米七轧机等，共计外汇43亿美元，故称“43方案”。

在这“一揽子”计划中，一米七轧机身价最高，不计国内配套设施，引进费用达6亿美元。

在这“一揽子”计划中，一米七轧机身价最高，不计国内配套设施，引进费用达6亿美元。



国家计委在引进一米七轧机的报告中阐述：“轧钢能力不足，钢材品种不配套，特别是板、管少是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进口一套一米七轧机，虽然用的外汇多一些，但和每年进口200万吨钢板所花外汇（约3亿美元）相比，还是合算的。考虑到国家外汇比较紧，可以一次订货分批进口或者先进口热连轧机和冷连轧机，硅钢片、镀锡和镀锌机组是否进口以后再定。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建议由冶金部、外贸部和国家计委指派人员成立小组专门来抓。”

周总理对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促进我国工业发展高度重视，指示“一学、二用、三改、四创”，要求有长远打算，在学习和掌握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对先进技术和设备研究、改进和创新。

落户：奋力实施“双四百”计划

党中央、国务院再三研究，决定将“一米七”放在武钢。

此前，武钢主动提出上“一米七”，上下不谋而合，都在思考尽快改变钢铁工业的落后面貌，跟上世界现代化技术发展的步伐。

那是1970年，国家编制“四五”计划（1971—1975），确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狠抓钢铁、军工、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大力发展新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冷轧厂第一卷冷轧薄板下线

武钢根据“四五”计划精神，提出了“四五”发展远景，将生产能力扩大为年产400万吨铁、400万吨钢（简称“双四百”），总体设计了“双四百”改造和新建项目。其中，新建项目有1700毫米热轧薄板厂、1700毫米冷轧薄板厂和318毫米无缝钢管厂，产能分别为150万吨、73万吨和12万吨。投产后，增加新的钢材品种有：轧薄板、热轧带钢，汽车板、镀锌板、镀锡板、硅钢片和无缝钢管。

这是“一米七”首次在武钢发展计划中出现，虽然没有单独设硅钢片厂，但可以生产国家需要的硅钢产品。基于经济实力，武钢只打算装备上海产的一米七轧机。

1972年，周恩来总理得知武钢准备上“一米七”，在日理万机中嘱托李先念副总理过问此事，恰好武钢党委书记李振江赴冶金部开会，李先念向李振江了解情况。李振江汇报后，请李副总理在资金上向武钢多倾斜一些，没好意思表达与国内几个大钢厂竞争引进“一米七”。

没想到，中央最后决定“一米七”建在武钢。

在外贸部和冶金部直接领导下，通过反复权衡，中央决定“一米七”成套设备和生产技术分别从西德和日本引进。

1974年3月27日，在北京签订冷轧薄板厂引进合同，设计年产冷轧薄板（卷）100万吨，对方为西德杜依斯堡市迪马克公司。

1974年6月3日，在北京签订热轧带钢厂和硅钢片厂引进合同，设计年产热轧带钢301万吨、冷轧硅钢片（卷）7万吨，对方为日本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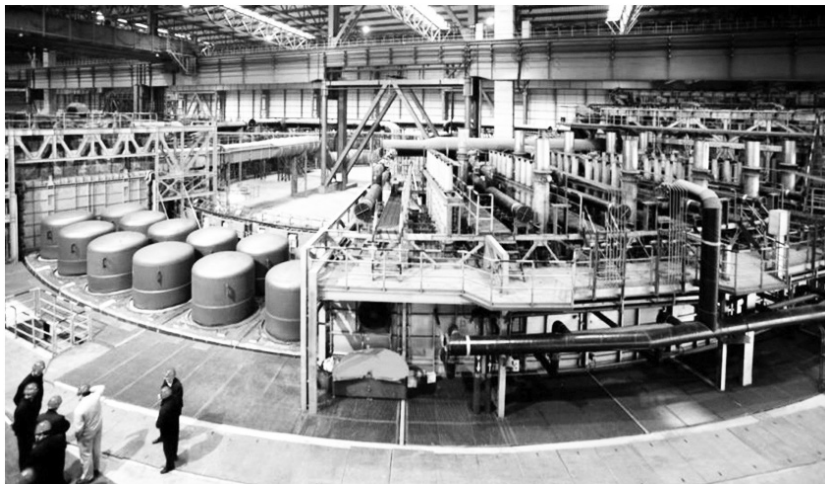
1974年8月30日，在北京签订连续铸锭机引进合同，设计年产150万吨板坯，对方为西德都塞尔多夫市施雷曼西马克公司。

“一米七”主要设备综合了炼钢工艺、机械制造、金相热处理、陶瓷化工和电气、液压传动、检测手段、信息传递、能源介质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新工艺、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轧制速度快。最高轧速热轧为23.3米/秒、冷轧为31米/秒，连铸机最大拉坯速度为2米/分。轧钢机均采用了快速换辊装置，一次换辊时间只需5至7分钟。

自动化程度高。轧制过程由25台电子计算机控制，冷连轧机、热连轧机最快每秒可运算100万次。电机一半以上是用可控硅调速的直流电机，其反应时间仅为0.3秒。大量采用液压传动，反应时间只需百分之几秒。

板卷大。连铸板坯长10米、宽1.6米，厚250毫米，重达30吨；热轧成品板卷重30吨，冷轧成品板卷最重达45吨。



硅钢厂环形退火炉

产品质量好，品种多，成材率高。热轧板厚度1.2~12.7毫米，厚度公差为正负50微米；冷轧板厚度0.15~3毫米，厚度公差可达正负5微米；冷轧硅钢片（卷）厚度0.28~0.5毫米，包括制作电机用的无取向硅钢片和制作变压器用的取向硅钢片。

会战：冶金战线的“淮海战役”

1974年盛夏，全国冶金建设公司中的一冶（负责冷轧工程）、十九冶（负责热轧工程）、十三冶（负责硅钢工程）、十五冶（负责连铸工程）、五冶、八冶、十六冶、十八冶、二十冶、二十二冶和湖北省基建队伍，地、县民兵队伍，共计十万人从四面八方会师“火炉”武汉。

9月7日一声令下，“一米七”工程开工，旌旗猎猎，机声隆隆，一场号称冶金战线的“淮海战役”打响了。

工程建设指挥部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派出19名干部和冶金部派出的工作组成员担任领导，湖北省委书记赵修任指挥长，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任副指挥长。指挥部下设11个分指挥部，按区域分工实行包建责任制。



二炼钢厂连铸车间生产线

“一米七”工程在我国冶金建设史上规模巨大，由143个单项组成（主体40项，辅助配套103项），超过以往武钢建设的总和。

工程指挥部在国务院和湖北省委的领导下，根据合同工期要求，交叉推进143项工程。先后组织三场战役：第一场“三通一平”；第二场以土建为主，辅之建筑安装；第三场以设备安装为主，辅之调整试车和竣工收尾。同时打响“六个歼灭战”：土方、基础、结构吊装、设备安装、调整试车、收尾竣工。

“三厂一车间”和各专业都成立了联络谈判小组，加强协调完善工程设计。冶金部基地建设总局局长、副指挥长李非平和武钢副经理张超然具体抓谈判。

武钢热轧厂工程师张国文，参加了与日方初步审查设计（专业动力系管网）的谈判。谈判组每天晚饭后都要开会，准备第二天资料，经常忙到转钟才能休息。他在回忆

文章中写道：“谈到热轧厂加热炉三个重油罐时，因为灭火问题双方争论不休，从8:30一直谈到00:30仍没有结果，第二天上午又接着谈到第三天凌晨3:00。中方认为，三个重油罐（每个罐容量为150立方米）万一着火怎么处理？一定要配有灭火装置。日方个别专家说这是‘买一个喝水的杯子还想要一个盖子’，中方回应‘我买的是茶杯，杯子不带盖子怎么泡茶？’多次据理力争，日方只得同意修改设计并向中方提供灭火设备。”谈判组最朴实的想法，就是有理有据为国家和武钢争取利益。

开工之时，武钢就未雨绸缪研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钢中含铜量的问题，差一点让“一米七”骑虎难下。

钢中有铜，利在提高耐腐蚀性和机械性能，害在产生加工热敏感性破坏钢的组织并发生网状裂纹。因此，国内外都视钢中含铜量高为“祸害”。

1975年2月，日本新日铁代表团来中国交流，询知武钢的钢中含铜达0.20%—0.35%后，领队说根据日本经验，硅钢中含铜量必须小于0.01%，否则通过不了热轧机，冷轧机也轧不了，产品的磁性也差。

这个问题太惊人，花40亿引进“一米七”和硅钢专利，如果不能轧硅钢片，如何向全国人民交待？武钢立即组织钢研所专家研究，由所长张春铭领衔。

新日铁代表团回国后，即正式来函申明：钢水中的铜最高不得超过0.02%，武钢的钢含铜量太高，会对热轧卷产生很大影响。

1975年12月，日方派员到北京技术谈判。武钢用对方的两项技术专利中钢含铜达0.1%—0.3%的结果，证明不一定是含铜的问题，日方才没有再坚持。



日本专家和热轧厂职工交流

武钢钢研所与上钢研究所、上钢一厂、上钢十厂等单位合作，用纯铁和结晶硅在高频感应炉中冶炼含铜量 0.22%—0.36% 的硅钢，经热轧、热处理所生产的硅钢片，均未发现异常现象。

试验研究结果出来以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联邦德国专家也说含铜钢用来冷轧不行。武钢抓紧试验，由于国内冷轧机速度都很慢，冶金部决定改造上钢十厂帮助试验。镀锡钢板试验在上钢一厂、上钢五厂和鞍钢进行，轧成原板均无“网裂”现象。在改造后的上钢十厂镀锡，各项指标正常且耐腐蚀性较好，表明铜在 0.40% 以下能保证镀锡质量。

最后，将所有试验过的含铜镀锡板，在江西食品研究所等单位做实罐试验，以鉴定其耐腐蚀性及对食品罐头的适应性，均检验合格，甚至堪比进口镀锡板。此后，含铜钢顺利轧出硅钢片、汽车板、镀锌板、镀锡板。

武钢边建设边培训近万名职工，300 多人选派到西德和日本实习，2600 多人在国内同业 83 个厂培训，1500 多人在大专院校培训，5000 多人在武钢内部各厂培训。部分人员被选拔参加设备安装和调试，在实

践中向外国专家学习，青年职工占 80% 以上，成为现代化生产的主力军。

为了总结经验，指挥部组织设计、施工、生产单位编写 130 万字的《武钢一米七工程技术总结》，为钢铁工业现代化提供重要借鉴。

1978 年 12 月，“一米七”工程竣工，进入调试阶段。1979 年，开始试

生产，运行良好。1980 年 10 月，国家计委、建委等部门到现场对工程预验收。

1981 年 12 月 12 日，经国家验收正式交付生产。通过设备功能考核和试生产，证明工程质量优良，设备性能良好，工艺先进，经济效益明显。

“一米七”工程建设，在受到“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两场运动干扰的情况下，仅用四年多时间就基本建成，堪称一大壮举。

驾驭：实现消化创新大飞跃

“一米七”试生产期间，面对国际先进水平，开始驾驭这匹“大洋马”并不顺利，离设计生产能力差距太大，引起国家领导人担忧。

1981 年 8 月，黄墨滨从包钢调任武钢经理，他以改革整顿为动力，从抓“三规三制”入手，大抓“三个变化”（生产、设备、精神面貌），发起“四恢复”“四同步”会战，加快对“一米七”技术消化、掌握、创新的步伐，争取“一米七”早日达产。

1982 年 9 月，张寿荣担任副经理、总



硅钢厂森吉米尔轧机生产线

工程师（1995年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墨滨给他压担子：一定要啃下“一米七”达产这块硬骨头。张寿荣院士晚年回忆总结说：“一米七”从熟悉、适应到消化、掌握以至开发、创新，走过了三个阶段。

1979年到1981年为试生产阶段，全系统正式通过国家验收。

这一阶段，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人员素质、前工序技术装备和生产工艺、能源介质系统等四个方面，与“一米七”系统要求不相适应。轧1吨硅钢需3吨坯料，轧1吨深冲板需2吨坯料，平炉冶炼08F等品种几乎炼成一半废一半。

武钢积极组织科研攻关，初步解决轧制含铜钢板、国产钢坯等难题，生产初步好转。同时，技术大练兵蓬勃兴起，那些连26个英语字母都认不全的工人，一个个苦学英

语、死背操作规程、蒙眼练习摁按钮。全系统1314个岗位实行考核上岗，提升了管理水平和操作技能。这一过程中，还形成了有名的“三争”精神——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为社会主义争光、各项工作争一流。

试生产期间，轧国外钢坯顺，轧国产钢坯卡，解决好控制模型是关键。

好在开工之前，冶金部和武钢选送约200名技术人员组成5个班，到北京钢铁学院进修并出国实习，培养了一批人才。特别是开设了一个“数学模型培训班”，由拥有大学学历的40人组成，日后在中国钢铁工业叱咤风云的刘本仁（武钢集团公司总经理）、刘玠（鞍钢集团公司董事长）都在其中。

曾呈校与刘本仁、刘玠同班，分配到冷轧厂自控车间软件班，成为武钢最早从事



冷轧厂五机架

计算机工作的人员之一。他认真研读“一米七”资料，学完了一个小型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源程序，但他因故没能出国实习，不属于外国专家的对口培训人员，只能旁听，不能动手。一次，曾呈校临时当替补，外国专家怀疑他的能力，便将



二炼钢厂兑铁水

“冷轧轧制极薄板轧制规程模型”让他编制。

曾呈校在课题组的支持下按时完成编制，并应用模型成功轧出0.2毫米厚的极限规格板，赢得专家信任。紧接着他又编制出“高速轧制情况下动态变规格的轧制模型”，专家称赞他创造了一个好方法。

曾呈校和软件组一起，在消化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解决了“五机架冷连轧机等负荷分配轧制规程数学模型”存在的死循环问题，研制出“轧制国产钢的数学模型”等模型，保证了五机架冷连轧机的正常生产。

热轧厂工程师朱培元也是“数模班”学员，1978年在日本培训实习后回国，担任热轧厂自控车间数模组负责人。他带回的计算机软件和数学模型说明书等资料，加起来有两尺多高。热轧厂刚一投产，武钢的钢坯不适应日本数学模型，很难通过。在车间主任刘玠领导下，他和同事采集成千上万个数据，终于建立国产钢的数学模型。余名炎等工程师结合数学模型，经过反复试验和研究，采取新工艺，让国产钢顺利通过洋轧机。

1982年至1985年为消化掌握阶段，达到设计生产能力。

在“一米七”系统内部，全面开展“四恢复”（恢复设备原有性能、精度、自动化程度和外貌），整改设备缺陷1000余项，完成重大攻关项目21项；在“一米七”系统外部，采取“以新促老全面提高”方针，对4号高炉、3号平炉、三烧结第二系列及5号焦炉实施“四同步”改造，高炉能提供需要的低硅硫铁水，平炉能提供低碳钢种，转炉精炼技术大大提高，让老装备适应新要求。

凭着一股“三争”精神拼搏进取，一项一项掌握引进的技术专利和技术诀窍，武钢完成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艰巨任务。

1986年到1992年为开发创新阶段，全面超过设计生产水平。

武钢瞄准国际钢铁工业先进水平，开始有计划的从设备、工艺、原材料、能源、产品等各方面开发创新，属于“一米七”系统的新技术项目，累计达197项。其中，具有19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有47项，比较重大的有12项，取得一大批重大科研成果：“转炉复合吹炼技术”获“七五”国家科技攻关奖，“大型板坯连铸机开发”获国家科



一米七轧机系统外景

科技进步一等奖，“铁路耐大气腐蚀钢”获“七五”国家科技攻关奖，“硅钢系列新产品开发”中的高磁感纯铁成功用于正负电子对撞机。

1990年，“武钢一米七轧机系统新技术开发与创新”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标志着武钢从引进消化到创新发展全面告捷。

对此，国内外专家给予高度评价：

第一，武钢充分发挥“一米七”技术主导作用，带动老厂系统全面改造，把整个装备工艺技术提高到适应引进新技术的水平，避免了老系统拖跨新系统的危险，开辟了新系统带动老系统的探索之路。

第二，武钢对引进的先进技术既认真学习借鉴又不盲目迷信停顿，不断发展创新，把消化同创新结合起来，使1970年代的“一米七”系统在许多关键性工艺装备技

术上跃入1980年代的国际新水平，开创了中国钢铁工业“引进—消化—创新—提高”的新局面。

“一米七”不仅是新中国引进的第一条现代化大规模轧钢生产线，还是全国现代化转炉炼钢、连铸和现代化轧钢技术人才的摇篮和输出基地。

今天，时代迅猛前进，武钢飞跃发展，“一米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2019年3月12日，国资委公布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核工业和钢铁行业）名录，“一米七”名列其中，传承创新文化，弘扬拼搏精神。

（本文图片摄影：咸铁成）

钟钢，武钢集团工会原副主席

华中工学院助跑武钢“一米七”

◇ 陈泽宇 夏增民

轮印：1974年，武钢引进一米七轧机系统，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发挥学科和属地优势，为武钢解决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自身也创新一批科技成果。

华中工学院与武汉钢铁公司一同建于1950年代，双方即开始良好合作。在“一米七”引进和调试的关键时刻，华工承担重大技术攻关，并派员解决突出疑难问题，有效维护了国家重大利益。

可控硅元件攻关一炮打响

第三次技术革命以来，硅及硅元件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对完全由电子计算机控制的一米七轧机而言，高质量的大功率可控硅元件具有关键作用。

1975年7月17日，第一机械工业部发函“拟针对可控硅元件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组织可靠性试验、表面保护绝缘材料、风冷散热器和管芯四个攻关组进行攻关”，要求各单位在“确保按期完成生产任务”的基础上，“着重在提高元件可靠性和使用寿命方面下功夫”。

华工接受任务，协同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上海整流器厂、北京变压器厂、西安电力整流器厂和长城低压开关厂，开展风冷大功率可控硅元件管芯的技术攻关。学院领导高度重视，在文件批示中强调：“请硅元件厂抓紧，抓紧！”

华工硅元件厂成立于1968年3月21日，在承接西南585所负责的451工程的过程中，有过成功研制平板型风冷硅整流元件的经验，但“一米七”所需要的“大电流高

压可控硅整流元件”技术难度极高，又要在1976年内完成攻关，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1975年8月，由电机系电器教研室罗志勇主持的硅元件组开始研制工作，1976年5月研制出500A/2000~2500V风冷可控硅整流元件的样品，两个月后就提供50只500A/1800~2000V平板型风冷可控硅整流元件，同时提供钢模铸造平板型铝硅散热器的设计图纸。8月，硅元件厂编写出《500A可控硅整流元件工艺操作规程》，为国家可控硅元件的技术攻关与规范化生产做出重要贡献。

“水”“火”配合解决冲击负荷

“一米七”具有大型化、高速化、连续化、自动化的特点，投产后用电量较大，对供电技术要求很高，最大冲击负荷达12万千瓦，而且波动频繁。如此规模的冲击负荷，在国外需要300万至400万千瓦运转容量的电力系统，但中国电力供需之间存在极大不平衡，尤其是与“一米七”直接

相关的湖北地区，实际运转容量经常只能达100万左右。因此，这不仅关系到“一米七”的安全运行，同时也影响湖北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

1975年2月起，水利电力部领导武钢及各科研院所，进行大量试验计算工作。5月27日，湖北省水利电力局发布《关于一米七轧机冲击负荷试验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工作计划》，要求华工为主要协作单位开展研究。动力系火电专业、电机系发配电专业师生，同青山热电厂、黄石发电厂、西安热工研究所、湖北电力中试所、西安交通大学等单位一起，参与相关试验研究和相关设备装置研发的技术攻关。

在葛洲坝水电站尚未建成的条件下，设备装置研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电力匮乏的“瓶颈”，必须对电力进行更为精细合理地调节分配。为了解决湖北电力系统承受“一米七”冲击负荷时的频率波动问题，华工发配电教研室与湖北电力中心试验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单位组成“三结合”小组，进行调频方案研究。当时调频普遍采用按频率偏差进行调节的方式，会引发集中急剧变化的冲击负荷，根本不适用于“一米七”，而采用跟踪调节的办法，对变化的冲击负荷进行直接检测，将其转换成电压讯号加以放大，用来控制原动机的输入功率，会使其大小随着冲击负荷的大小而变化，如此就大大地提高了调节的速度和精度。

然而，火电厂发电



1983年，华工电机实验室学生上课

机组可以人为控制，水电站发电量则主要受自然河流流量流速影响，因此采取跟踪调节，多以火电厂承受冲击负荷。但湖北河流众多，水电比重高于火电，光靠火电厂无法承担“一米七”引起的冲击负荷。华工发配电教研室经过理论分析，提出了水电火电互相配合的功率跟踪调节方案：将冲击负荷部分转移给丹江水电站，而冲击负荷与丹江水电站实际能承受的负荷量的差额，则由青山热电厂承担。通过分配和转移冲击负荷，克服水电站调节速度慢的障碍，使之也能承担一部分冲击负荷，达到跟踪调节的最佳效果。这一方案当时在国内为首次采用。

1976年上半年，华工发配电教研室研制出分配转移装置的样机，并与湖北电力中心试验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单位研制的其他装置一起，在华工动态模拟实验室进行两次大型系统性试验。试验证明，当湖北电力系统承受15万千瓦冲击负荷时，采用水电火电联合的功率跟踪调节，并在丹江水电站采取加速措施，可以使系统频率波动大为降低（由1.2周/秒降低到0.2~0.4周/秒），能在不增加发电机容量的情况下兼顾客观条件与设计要

求。1977年1月底，湖北省电力局召开方案审查会，邀请水电部科技司、电网研究所、西安热工研究所参加，认为该跟踪方案可行。基于这一方案成果，协作单位共同形成了《冲击负荷跟踪调节系统联合试验报告》的学术成果。

技工刘云扬让德方专家服输

1978年7月时值酷暑，武汉气温高达40℃左右，冷轧薄板厂整套设备进入紧张调试阶段，然而中央控制室由美国进口的空调

设备，经联邦德国（西德）专家多次调试都没有调好，以致中央控制室计算机不能正常使用，其它设备也无法调试。

德方专家组组长汉司纳·卡拉德焦急万分，先将私人带来的三台卧室用窗式空调设备搬至操作室及控制室，但由于功率过小，无法达到降温要求。汉司纳拍电报回国寄来检查仪表，又拍电报到香港要求派专家来汉修理，但香港方面一个月后才能来人，势必要拖延整个工程进度。

负责冷轧薄板厂设备安装的一冶党委向华工求援，华工派出制冷教研室技工刘云扬和教师郑贤德、郑其祥等前往，但汉司纳出于对中国技术水平的不信任，不让刘云扬等人插手空调调试，更不允许使用他的检查仪表。刘云扬等人自主设计检查仪器，请一冶机修厂工人突击制造，用其检查测试空调设备故障，最终发现其主要原因是制冷剂少及控制仪表没有调好。一冶党委安排了一次空调设备调试技术谈判会，刘云扬、郑贤德等人作出分析，并提出可用自制仪器当场进行调试，但汉司纳出于对德方技术的自信，仍不同意刘云扬等人调试空调设备。

在一冶党委的支持下，刘云扬等人利用德方专家下班后的晚间，对空调设备反复进行调试，华工制冷教研室的张铭三、李文林也赶到现场协助。经过连续三夜调试，空调设备终于投入正常运行。汉司纳甚为惊异，主动要求同刘云扬等人见面，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赠送笔记本等表示感谢。一冶党委也给华工送来了感谢信。

1978年11月17日华工通报全院：“刘云扬、郑贤德、郑其祥等同志，在困难面前勇于承担任务，既有革命干劲又有科学态度，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这种精神值得学习，特给予通报表扬。”

教授任元与日方较量获胜

1979年1月5日，武钢热轧厂的精轧机系统投入试运行，但当负荷达到额定指标的60%时，即发生少见的电气振荡现象，无法继续工作，并极大威胁轧机的安全。

早在1974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第一次记载了热轧系统的振荡现象，发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物理现象，时至1980年也未从理论上解决问题，足以说明它成为世界性难题。

日本新日铁代表出于逃避技术责任的考虑，在与中方对话中态度傲慢，一再强调其轧机技术上的先进性，认为振荡不是轧机本身造成的，企图把问题推到比利时提供的无功补偿装置上。

在冶金部的领导下，武钢同一冶、十九冶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谈判小组，1979年2月要求比方派人来华，一起弄清情况、分清责任、解决问题。在中方谈判小组的名单中，武钢能源处褚巨康、热轧厂苏骁、供电厂古福立三位电气工程师，均为华工校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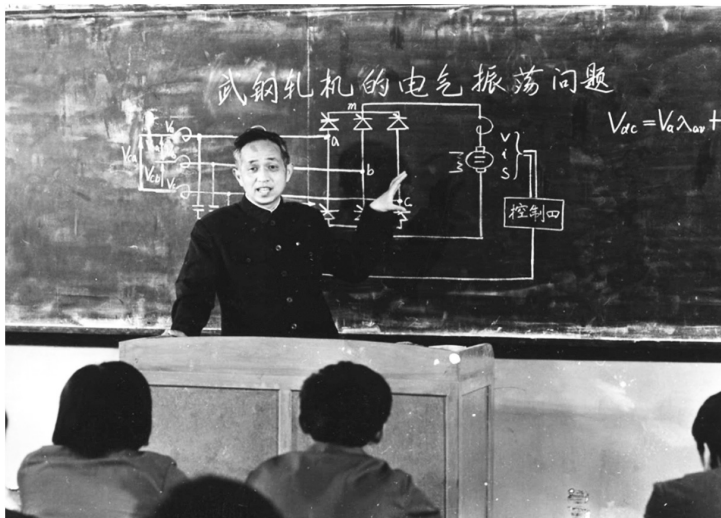
比利时ACEC公司派员来汉，通过理论计算，论证出所提供的无功补偿装置并无故障，但日方始终坚持其轧机也没问题。中方谈判代表、武钢能源处总工程师汪泽民来华工，求助于电机系教授任元。任元教授通过理论推演与分析认为，轧机的振荡，可能是由于可控硅控制系统的控制角不稳定而产生了二次（二倍于50周）、三次（三倍于50周）谐波电流引起的。

对任元教授的结论，日方代表

无力反驳，便联系日本东芝研究所副所长山口博士来武汉参加谈判。通过有针对性的技术研讨，山口承认当前设备有造成三次谐波的可能，遂联系东芝电气公司派专人来武汉对线路进行改进，减少了三次谐波，但并未解决根本问题，振荡依然发生。

日方再次表现出急于推卸责任的态度，山口根据实验记录的波形作出分析结论，提出了六点声明，核心内容即肯定振荡不是轧机引起的，而是无功补偿装置有问题。在比方的配合下，中方开展了长时间的数理推演与实验，掌握了充分的数据，足以证明并非该装置发生振荡，但日方仍不肯承担技术责任，又将矛盾焦点转向中方供电系统，并从国内增派了新日铁电气部长高田博士、东芝设计科长贞杰、轧机控制系统设计负责人舟桥来武汉谈判，力图证明振荡是由中方同步电源的波形畸变引起的。中方谈判代表理论掌握不足，难以驳倒日方的论点，谈判持续陷入僵局。

7月下旬，武钢派代理主谈人王兆元来华工，请求派专家给予理论层面的支援。鉴于任元教授对无功补偿装置有深入研究，华



任元教授讲授武钢轧机电气振荡问题

工派他前往参加谈判。

8月8日，任元教授到武钢，担任谈判小组技术顾问。他同武钢工程技术人员一道，对轧机系统振荡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试验，提出了动态系统稳定性理论、负电阻理论和相位论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驳回日方对中方电网系统的质疑，进一步论证了振源来自轧机、责任在于日方的客观结论。

11月15日，中、日、比三方签订了《关于武钢热轧厂轧机系统振荡问题的确认书》，确认振荡的发生与动态系统中的轧机工作状况有关，今后重点放在轧机方面，比利时代表退出谈判。

其后，围绕如何改良轧机系统以消除振荡，中日双方代表继续谈判。起初，日方提出了更换轧机控制系统的方案，希望采用落后的两环控制系统来代替三环（即电压环、电流环、速度环）控制系统，受到中方反对。中方认为，这一方案违背合约，降低了日方所提供轧机的技术设计要求，给中方造成经济损失，因而日方应在保留三环系统的基础上解决振荡问题。日方却未给出合理的改良方案，认为继续采用三环控制系统并不可行。

面对僵局，任元教授提出采用通带滤波器解决振荡的方案，并在理论分析的同时，给出装置的具体接线和参数。经过多次辩论，日方接受了该方案，12月12日同中方签订《武钢热轧厂精轧主机系统振荡问题的确认书（二）》指出：“双方一致认为，应为实现按合同提供的三环（即电压环、电流环、速度环）控制系统可靠地满足生产要求而努力”“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中方建议在控制回路内增加滤波器的方案，日方表示值得研究。双方认为可作为当前共同研究的重点方案，由日方带回立即研究并同时设计

制造滤波器，争取在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五日，最晚在四月三十日前返抵武钢，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和试验”。

1980年4月25日，日方代表返抵武钢，带来了根据中方提出的设计方案制造的通带滤波装置，但作出了部分改动，即“将两套滤波装置并联使用和将频率整定值提高14.5%”。

5月13日，双方以日方修改的方案数据为准，进行了第一次大负荷轧制试验，虽未产生剧烈振荡，且达到自谈判以来的最好效果，但也出现了2.37次谐波的微振。由于这一微振对轧制和工艺设备并无不良影响，日方基于减少损失及维护自身技术的国际地位，认为试验已取得完全成功，急于退出谈判。中方认为，这一试验结果并不代表振荡问题的彻底解决，应在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加以巩固和提高。之后近一个月，双方以研究寻求最佳参数为核心内容，最终统一意见，对角频率参数进行调整。

6月3日，双方进行了第二次试验，试验结果较前次有明显改善，当冲击负荷达到合同规定最大值时不再振荡，但当功率提高后轧机再次出现微振现象。日方再次推卸责任，认为微振由中方电网电压低引起，试验应到此为止。中方则认为，应较合同规定留出一定的稳定富裕度，以保障此后轧机应用于生产实际后不会再受振荡问题困扰，且中方电网电压符合合同规定，微振的主要原因仍是滤波器的参数尚未调整至最佳。在中方的据理力争下，日方勉强表示将配合中方最后进行一次试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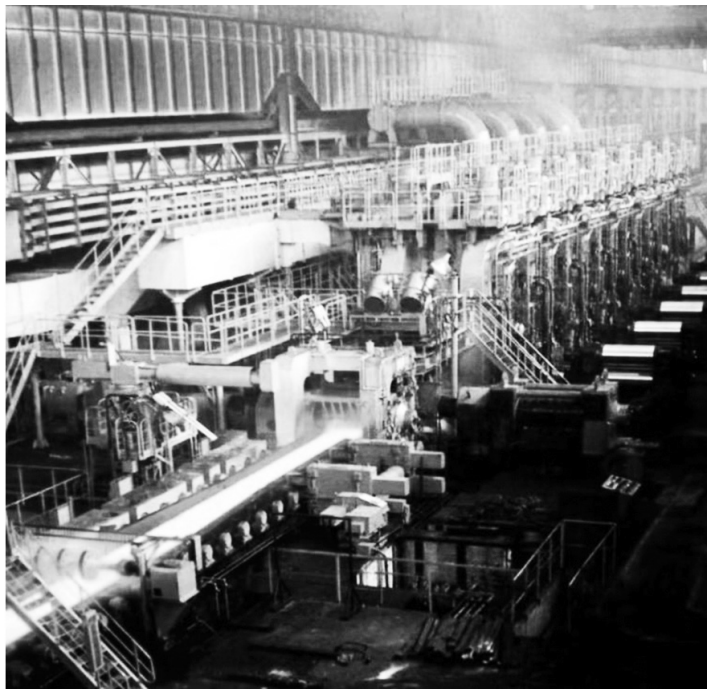
6月14日，双方进行了第三次试验，试验结果完全成功，甚至中方在试验过程中有意降低电压，轧机也未发生任何振荡现象。可日方代表在起草《最终确认书（草稿）》

时,避而不谈产生振荡的技术责任,相反违背客观事实,称振荡问题是“日方单独协助中国”解决的,甚至提出中方赔偿损失的无理要求。

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否定日方推卸责任的说法,任元教授认真考虑了对策,向中方谈判小组提出,应该“明确肯定振荡来源于轧机系统,责任在于日方,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技术成果主要属于中方”,并起草了相应条文。

在后续谈判中,双方未能就“最终确认书”内容取得一致意见。日方代表自知在技术责任上理亏,签订“最终确认书”将有损其轧机技术的国际地位,竟单方决定回国。直至年底,日方才以无偿提供125万美元设备的形式,对中方损失进行了赔偿。

在这一过程中,任元教授关于轧机电气振荡问题的研究,产出一系列的高水平科研成果。论文《可控静止补偿装置在轧机失去稳定情况下的特性》,1980年8月在伦敦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得到各国专家的高度评价;另三篇论文也于1981年在《华中工学院学报》发表。任元教授相关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分析武钢一米七热精轧机系统交直流耦合振荡的“脉动开关函数”新概念及其理论计算方法》,1985年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同年9月,《脉动开关函数及其应用——交直流耦合振荡分析》一书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朱九思院长作序高度评价任元教授的研究,认为“脉动开关函数”这一理论是我国科研人员的原创;武钢热轧机系统电气震荡问题的解决,是“高等学校和生产部门相结合、理论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相结合”的范例。



“一米七”热轧厂生产线 咸铁城摄

华工为“一米七”做出了贡献,“一米七”也给华工提供了接触世界先进科技的机会。1979年3月3日,华工通过“一米七”工程指挥部外事处,邀请日本、西德专家来校讲学,重点提出自动控制、计算机科学、液压技术等世界前沿科技和现代管理科学课题,每个专题安排6—9小时,充分展现了华工领导在科技和学术研究上的前瞻性,为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起到重要作用。

(本文得到华中科技大学档案馆支持并供图)

夏增民、陈泽宇,分别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和研究生

我的参政议政“情结”

◇ 陶志阳

人物名片：陶志阳，农工党武汉市委常委、东西湖区工委主委；市政协委员、东西湖区政协常委，东西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2003年我加入农工党以来，在参政议政工作上取得许多亮眼的成绩：撰写调研报告近20篇、政协提案100多篇和社情民意近300篇。在此撷取我的几个参政议政工作片段，以此告诉后来年轻的党员们，履职必须有担当，参政才能有力量。

我的第一篇提案——不能让东西湖被误解

2001年底，作为新政协委员，在当年的区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我没有发表任何建言，也没有上交任何政协提案。一个不发表任何建言、不上交任何提案、不反映任何社情民意的政协委员是苦恼的。

2002年底马上又要开政协会议了，我正在为写不出提案发愁。恰好有一个大学同



获得“同心奋斗者”荣誉称号

学路过武汉，吃饭时同学对我说：“今天的《楚天都市报》，有三篇关于东西湖区的报道，有两个是杀人，一个是骗钱。说说你那个区是什么地方，不是杀人，就是放火。”另一个同学接着说，大家都说晚上不敢到东西湖区去。一时让我十分尴尬，没了面子。

当晚我找出当天的《武汉晚报》和《楚天都市报》，的确，两份报纸上都有关于东西湖区杀人和骗钱的“传奇式”报道。故事尽管新奇，但对东西湖区的形象影响太负面了。个案不代表整体，我突然找到了提案的切入点，可以给区委、区政府提点建议。过了几天，区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召开，我上交了自己第一篇政协提案《关于正确引导舆论，正面宣传东西湖区的建议》。

这份提案 300 多字，把近一个月来《楚天都市报》上有关东西湖区的报道进行了数据罗列，建议也只有一条：为东西湖区发展

负责，加大正面宣传力度。第一次上交提案，我十分紧张，担心会得罪人。这个提案太短，应该说份量很轻，没想到引起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区委宣传部领导多次与我沟通，通报提案办理情况及扭转东西湖区形象的有关措施。

在区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上，我的提案被评为优秀个人提案受到表彰，发放了奖金和奖状。正是这篇优秀提案打开了我观察分析社会问题、了解社会热点、反映社会痛点、提出个人建议的信心。

八易其稿——吴家山人有了自己的卫生院

由于历史原因，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没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院，只有一家以医疗为主的人民医院，严重影响辖区居民享受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我作为一名有公共卫生专业背景、农工党员身份的政协委员，连续多年提出要在吴家山街建设一家一级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履行社区卫生的职能。尽管区政协和区卫生局对提案相当重视，但涉及的职能部门太多，公共卫生服务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当时的主要公共卫生供需矛盾还没有凸现出来，吴家山街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进展不大。

尽管一直没能立案，但在各种场合，我坚持呼吁在吴家山街实施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进社区工作，形成功能合理、方便群众的城乡一体化社区卫生服务网络，逐渐向全区推进。

在我呼吁下，2019年，区政协终于决定将建设吴家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列为当年建议案。我百感交集，主动向分管政协

主席要求撰写这个建议案，理由是没有谁比我更了解这件事。我在接到任务后的15天就完成建议案的第一稿，5600余字，后经过7次修改文字最终控制在2200字以内。在区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关于推进吴家山街基本医疗保障进社区工作的建议》在全体政协委员的掌声中通过。

如今，区人民医院下辖的吴家山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投入使用15年，切实解决了吴家山街14万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问题。同时作为一名农工党员，我也一直在关注其后续生存与发展，每隔几年就组织党员对其运行进行调研，帮助解决了不少的问题。

写好一个建议案需要集中许多人的智慧，能成为建议案离不开多年关注和反复调研，同时离不开政策的支持，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印象最深的建言——阻止音乐节在府河湿地举办

在我写过的众多社情民意中，有一篇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题目是《禁止举办大型户外活动，保护府河湿地生态资源的紧急建议》。

2014年10月的一天，负责血防的所长到我办公室闲聊，说最近好忙，区里又要在柏泉府河草地上举办第二届音乐节。为此他



天鹅在府河湿地上空飞翔

们压力很大，因为府河有虹螺，要想办法阻止游人接触府河河水，避免感染血吸虫病。

为了搞好音乐节，公安、电力、环卫部门都很头痛，上年10月的音乐节留下100多吨生活垃圾，草地、水面、水下都有，环卫部门和柏泉街道用了好几个星期来收集转运处理，还有不少垃圾遗留没办法清理。

我一边与之聊天，一边花30分钟撰写了一篇紧急建议《禁止举办大型户外活动，保护府河湿地生态资源建议》，从三个方面阐述在府河湿地举办大型文体活动的危害：一是大型文体活动的增多会增加人们感染血吸虫病的风险。二是大型文体活动侵扰了野生鸟类的栖息环境。如果对这一地区不加以管理和限制，武汉将会在未来几年内失去这来之不易的“武汉天鹅湖”。三是大型文体活动会破坏府河湿地的生态环境。与府河带来的旅游资源相比，我们更应该重视府河的湿地生态资源。

建议有关部门当机立断禁止在府河湿地举办音乐节，同时尽快采取措施，对府河湿地这一优越的生态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并提出了音乐节异地（石榴红村）举办替代方

案、府河湿地保护方案。

这篇社情民意，当天我就提交给区政协办公室，引起区政协领导高度重视，立即作为一周以后的政协主席、区长协商会重点建言。会上，区长听完我的建议后马上决定第二届音乐节异地举办，并且承诺投入资金加强对府河湿地的保护，并站起身对我的建言表示感谢。后

来，我对府河开展了长期的调研，形成府河湿地保护一系列调研报告，获得农工党省委会奖励（一等奖），揭榜挂帅《府河流域综合治理有关建议》课题调研。

跨越 20 年——守来农场卫生院的春天

因历史原因，东西湖区基层卫生院一直由各农场举办，区卫生局对各农场卫生院只有指导职责，并不参与管理，严重影响了全区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各单位资源分布极不平衡。

上世纪 90 年代，农场企业纷纷垮掉，经济效益下滑，各农场卫生院工资都发不出来，大量专业人员流失，医疗服务质量不能保证。农工党东西湖区支部老党员经过多次调研，开始以提案、党外人士建言等形式呼吁农场卫生院收归区办区管。刚开始提出来时，有些领导，甚至区卫生局的领导觉得他们“多事”，体制的问题怎么可能改变得了。

2003 年以后，我作为具备农工党员身份的政协委员，就农场卫生院区办区管工作



武汉市疾控体系建设新闻发布会现场

开展深入调研，多次到外地学习考察，坚持每年就同一议题撰写政协提案。

2009 年，这个建议终于引起区委、区政府重视，实行体制改革，将各农场卫生院收归区办区管，由区里统一进行资源配置、规划布局、资金投入、人员管理、考核结算。各农场卫生院也更名为街道办事处卫生院。自此，东西湖区基层医疗机构迎来了春天，形成了许多向全国全省推介的先进经验。

一篇提案，经过几届农工党政协委员的努力，从提出到最后办成，用了差不多 20 年。参政议政要有坚持与守候的耐性，认准了的要坚持，能忍得住白眼、抗得住打击、守得住寂寞，不要老想着别人理解。当一件不可能办成的提案最后办成，对我个人而言增加了自信，树立了“倔强”“较真”“坚持”的形象，也给了我挑战更高目标的动力。

一个超前提案——建议人民医院异地重建

东西湖人民医院是东西湖区唯一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教学和科研于一体的



位于新址的东西湖区人民医院

综合性二级甲等医院，2008年医院仅有床位600张，年门诊量超过40万人次，包含区域和空间逐渐不能满足全区居民的就医需求。

农工党界别的政协委员组建调研组，就人民医院未来发展做了大量调研和反复论证，建议区委、区政府：放弃对人民医院修修补补的想法，实施异地重建，重建地点选择金山大道以北区域。

提出这个想法时，调研组的成员都吓了一跳，感觉太超前了，当时的金山大道以北为丘陵地带，一片荒凉，散落着不少村庄，交通极不方便。然而人民医院异地重建之路十分艰难，几度放弃又几度重提。区农工工委持续开展调研，由我执笔每年上交同一提案，推动异地重建工作。

终于在2013年，区委、区政府作出重大决定，异地重建的人民医院选址在径河街道金北一路（金山大道北第一条马路简称），位于规划中的吴家山新城（后改为径河新城）核心位置。当年新人民医院建设在一片稻田之中，却是如今高楼林立的径河新城第一座动工的建筑，也可以说，新人民医院的建成促成了径河新城的快速发展。

现位置距离当年我们建议新址不到400

米，占地面积170亩，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规划开放床位1500张。2019年5月28日，被协和医院托管的东西湖区人民医院完成整体搬迁。又经过5年努力，院区达到三级甲等医院标准，成为武汉临空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唯一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急救、社区卫生服务于一体的三级综合医院，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我所在的区疾控中心也于2022年春在新区人民医院一墙之隔的地方建成并投入使用。坐在办公室里，每天看着高端大气的新人民医院，回忆起当年首次提出异地重建的想法，颇感欣慰。

红色“徐家军”（下）

◇ 刘祖书 徐光思

历数次改编，走上长征路

1929年6月，党中央派徐向前从上海来到鄂东北，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实际上担负着全师领导工作。9月，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两块根据地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将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冈、商城、光山、罗山8县划为鄂豫边特区，成立鄂豫边临时特委和革命委员会，徐向前任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

工农革命鄂东军改编组成红三十一师，徐海东此时就是徐向前军队中的一员虎将。1929年底，鄂豫边革命委员会给党中央报

告中说到：“……黄陂有长枪30余支、盒子枪40余支，成立有游击队、特务队、手枪队，还有一只‘徐老虎’。”

1930年初，党中央决定将鄂豫皖边区红军改编为红一军，原三十一师改编为红一军红一师，徐向前任红一军副军长兼红一师师长。至5月初，经正式改编后的红一军红一师下辖5个大队，共800余人。6月中旬，红一师在徐向前的指挥下，袭击了杨家寨车站，歼敌郭汝栋部2个连，缴枪120余支。随后移驻夏店，将徐海东的地方武装（教导队）和预备队的新兵全部整编到红一师，全师总人数增加到1200余人。

6月29日，徐向前率领扩编后的红一



徐海东

师主力埋伏于阳平口，展开阳平口伏击战。徐海东的“徐家军”发挥熟悉地形，善打埋伏的优势，按照“设口袋阵、诱敌入袋”的战略部署，将敌人诱进埋伏圈内歼灭。此役俘敌团长以下官兵 100 余人，缴枪 800 余支。

8 月下旬，红一师诱敌至四姑墩，实施迂回包抄，又歼敌 1 个营。红一师在河口以北、四姑墩以东的黄柴畈进行整编，人数增至 1500 人。后又全歼国民党钱大钧教导师第五团，部队新增一个机炮混成团，人数达到 3000 余人。当时，鄂豫边区流传着红一师战斗生活的歌谣：“平汉游击五十天，三战三捷三扩编。红军声势震武汉，革命烽火遍地燃。”

在历次改编中，“徐家军”队员被编入不同的作战单位，但不管队员在哪里作战，他们仍然保持着战斗风采。

1929 年底，鄂豫边区党委将区内的游击队组成 5 个教导队，“徐家军”编入第五

教导队，徐海东任第五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1931 年 2 月，第五教导队编入中共鄂豫皖军委警卫团，徐海东任警卫二团团长。1931 年 3 月，警卫二团改编为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徐海东任团长。此时的“徐家军”队员近千人被分别编入红四军十三师的三个团，经过多次战斗，成为十三师各团的骨干成员，很多“徐家军”队员从战士升到班排长、连长、营长等指挥员位置上。

1932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徐海东带领红二十七师来到金家铺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领导的英山独立团，六安、霍邱、霍山独立营会合，组成东路游击师，徐海东任师长。后来，这支游击师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徐海东任七十九师师长。

1934 年 4 月，徐海东与吴焕先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省商城县豹子岩会师，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此时，“徐家军”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幸存的数百人被编入红二十五军，有部分幸存的“徐家军”队员随红四方面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

为有牺牲多壮志，烈士英名永流传

1932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略转移越过平汉铁路后，蒋介石从“围剿”鄂豫皖的重兵中抽调 10 余万兵力尾随“追剿”红四方面军主力，留下 20 万主力在鄂豫皖边区，继续“围剿”坚持战斗的红军队伍和地方革命武装。在国民党重兵进攻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大部分丧失，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只能随部队打游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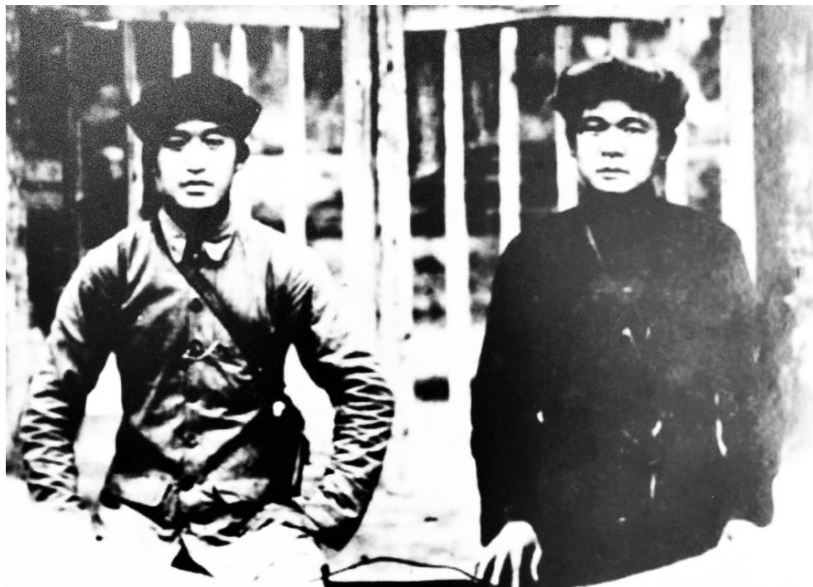
1933 年 1 月 1 日，国民党政府以鄂豫皖边界“形势重要，距城太远，控制不便”为由，根据“新收复区设县纲要”，拨湖北

黄安县的吕王、枣林、羊角、老山、华上、黄站等6会，黄陂县河口里10会，夏店里5会，孝感县四、五区，河南省罗山县姚约、老约、沙上约、沙下约、胜约，合并建置礼山县，隶属湖北省第四行政公署。县治设毛家集，首任县长蒋章骥（又名蒋少缓）。

毛家集离徐海东家只有五六里，平时驻着国民党一个团的部队守卫。礼山建县后，国民党实行保甲连坐，疯狂屠杀根据地干部、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人民的摧残极其残忍，地主“清乡团”对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徐海东的家族更是首当其冲。

徐大明，是徐海东的祖父辈，被徐海东这一辈的兄弟们尊称“么爹”。1929年2月，徐大明跟随徐海东参加夏区年关暴动。1931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组织“清乡团”袭击七里坪的革命群众，徐大明率领全排随军保护群众，与敌人发生激烈的战斗。战斗中，徐大明不顾个人安危，端起轻机枪对着敌人狂扫猛射，不料左肩、右耳、大腿、肚子、胸口中弹，鲜血染红了他的全身，倒在草丛里。

徐有义，徐海东的二伯父。1927年8月20日徐海东回乡时，曾多次找年逾古稀的徐有义谈革命道理，讲外面的变化，使徐有义从对革命模糊到向往革命、支持革命，并积极要求入党。他曾多次为组织传递情报，并为遇到危险的革命同志带路、送饭。1933年1月，国民党礼山县政府建立保安



红二十五军时期的徐海东（右）

队。随即，反动武装赴徐海东家乡大肆屠杀百姓，焚烧房屋。徐有义看到家乡和徐家遭受如此的苦难，他想挽救乡亲和徐家人。老人走进一间房舍里，敌人堆起干柴点火，把徐有义给活活地烧死了！场面极其悲壮。

徐吝氏，徐海东的族祖母，出生于新城镇吝家湾，嫁于徐家洼。1930年春，徐吝氏入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1932年7月，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了第四次“围剿”，徐吝氏不顾个人生命危险，积极主动联络根据地及白区的地下党，将获取的情报送给红军部队。1932年冬，徐吝氏在前往刘家湾给地下党送情报时，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领导的“清乡团”抓住，并残忍杀害于刘家湾。

徐忠占，徐海东的族叔。1930年初，徐忠占被赤卫军安排当了一名交通联络员。1932年夏天，赤卫军在彭陈店颜家磅、老山与新府老岳沟地主民团进行了几次激烈艰苦的战斗。一天傍晚，赤卫军被迫往水竹沟方向撤退，派交通员徐忠占火速送信。途中，徐忠占右腿中弹负伤，行走困难，未

能及时撤走，避入五鹰寨树林中躲藏，不幸被搜山的丁家民团抓住，送往毛家集牢房。在牢房中，他遭受到民团的严刑拷打，后又被关闭土牢。为“杀一儆百”，反动民团于1933年夏，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将徐忠占按入小丁湾一粪窖中活活淹死。

徐泥巴，徐海东的族叔。1931年3月，成为赤卫军战士。1933年秋，徐泥巴接到田家咀秋收保卫战命令后，带着一个排下到沟底，顺河流而上，来到战斗最佳阻击位置中学岭。中学岭是敌人自河背咀回毛家集最近的路，敌人这次到河背咀“打秋风”动用了正规军一个排，以及“清乡团”共50余人另加一辆汽车。阻击队伍赶到中学岭，埋伏好没多久，返回的敌人进入伏击圈，排长一声令下，徐泥巴一枪打死最前面汽车的司机。战士们跃出隐蔽点，扑向敌人。就在此时，两颗手榴弹在身边炸响，冲锋中的徐泥巴倒下了，英勇牺牲在战场上。

徐元江，徐海东的三哥。他胆大心细，为人忠厚，作为党的地下联络人，为革命做出了贡献。1933年，徐元江被地主“清乡团”抓到后，捆绑拖行到徐家洼北边的严家河，交给来当地“围剿”的国民党反动派。反动派头子气急败坏地大吼，先照着徐元江的嘴狠狠地砍了一刀，徐元江满身鲜血，反动派士兵接着又对着徐元江的头乱砍一通，最后把整个头砍了下来。

徐元海，徐海东的四哥。他对徐海东创建革命武装贡献最大，于1929年2月9日晚，带头参加夏区“年关暴动”。1930年5月27日，带头参加新街吴家大畈的战斗。1931年8月，徐元海任乡苏维埃秘书。1932年12月12日，蒋介石下令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大规模划区“清剿”，经(扶)黄(安)“清剿”区指挥官卫立煌，指挥部

设在河口，兵力7个师，分别“驻剿”河口、黄安、麻城、新集、宣化店等地。

敌人修筑碉堡，封山控道，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根据地形势更加危急。徐元海积极配合红军，参加了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反“围剿”斗争。在极端艰苦环境下，他没有因困难而退缩，带领长子徐文皆一起参加战斗，22岁的徐文皆不久在一次战斗中牺牲。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徐元海遭国民党逮捕，被反动派刽子手杀害于新城毛家集，时年43岁。不久，二儿子徐文棠也在作战中牺牲。

徐元典，徐海东的堂兄。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窑工厂党小组长，1933年在麻城牺牲。其长子徐文朗，1929年随徐海东参加夏区“年关暴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开始部署对鄂豫皖边区的第四次“围剿”。10月8日，红四方面军抵达河口，遇胡宗南第一师和八十八师，红军血战毙伤敌军2000多人，第二天又毙伤敌军近千人，但红军损失也十分惨重。徐文朗为配合红军主力打击进入河口一带的敌军，率领教导队战士奋战数夜，终因体力不支，身中数十弹，光荣流血牺牲。

大哥徐元喜牺牲于1932年；二哥徐元亭牺牲于1928年；五哥徐元波，曾任中共夏区三乡党支部委员、第一窑工厂党支部书记，1932年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于七里坪战斗。

1930年冬，徐海东母亲徐吴氏在逃难途中冻饿而死。

李春芳，徐海东堂婶母，1931年参加革命，地下工作人员，1932年在黄陂县刘家湾被敌人杀害。

堂兄徐元大，曾任陂孝北县军事指挥

长、县保卫局审讯股长、鄂豫皖省工会主席等职，1932年底被杀害于严家河。

舅表侄吴正刚，1933年2月开展革命活动时，由于还乡团告密，被国民党逮捕，严刑拷打，后被残忍杀害。吴正刚年仅12岁的儿子吴桃源，得知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说了一句要替父亲报仇的话，也被国民党杀害。

堂弟徐永一，1932年红四方面军在黄柴贩会议后撤离鄂豫皖苏区，随部队转战至川陕苏区，1934年在川陕苏区作战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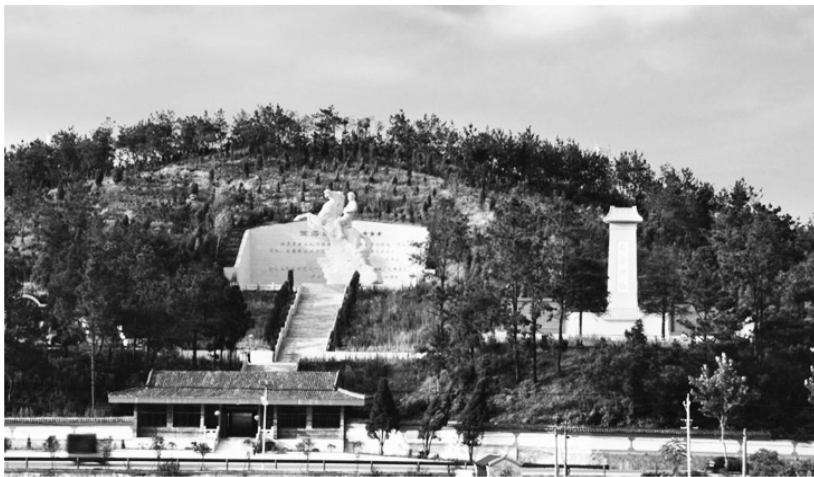
堂兄徐元洪，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窑工厂党支部委员，后参加红军，随红二十五军长征。1939年组织派遣回乡组织抗日武装，途经湖北谷城县被日军杀害。

侄子徐文初，1928年入党，1934年参加红军，任皖鄂特委委员、秘书长，和何耀榜一道领导皖鄂地区三年游击战争，参与完成红二十八军和国民党军在岳西青天畈的和平谈判。1937年底赴延安抗大学习，后参加新四军第五师，任政治部秘书、后勤部军需科科长。1947年在罗田县被捕牺牲。

1933年6月，红二十五军围攻红安县七里坪时，副军长徐海东一次打粮时带队伍回过徐家窑。父母亲虽然不在了，但徐海东回到家乡，感觉就像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但看到眼前的徐家窑，到处都是烧黑的断墙残垣，到处是污秽和

血腥，家家的锅碗瓢盆、陶缸陶罐打碎了，破旧衣服和生活用品扔的到处都是，满眼尽是一片劫后余生的景象。

乡亲们向徐海东倾诉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清乡团”的滔天罪行。他们一个个热泪盈眶，纷纷要求讨还血债。群众的血泪控诉，激起了徐海东和干部、战士的满腔怒火。第七十四师立即向土豪劣绅“清乡团”展开了猛烈反击，广大群众亦奋起响应。作战中，乡亲们就像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配合。不几天，就消灭和驱逐了新城镇周边等地的一些反动民团，打得敌人屁滚尿流。



徐海东亲属烈士陵园及纪念碑（碑名为徐向前题）

面对亲属们的牺牲，徐海东内心十分哀痛，但他用超乎常人的力量，把仇恨和悲痛强压在心底。亲人们已经牺牲了，革命需要自己的不是悲哀，而是战斗，活着的人要挺起胸来，把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残酷战争洗礼的徐海东，同样是九死一生。他在建立赫赫战功的同时，身体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数次的战斗中，先后9次负伤，身上17处伤疤，尤其是左眼下面的脸颊上

打进的一颗子弹，从耳后穿出，致使左耳失聪。他身体累垮了，长期卧床养病长达30年。1955年9月27日，徐海东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1970年，逝世于郑州。1975年，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颁发的烈士证。

据我们调查并经专家研究确定，在革命战争年代，徐海东亲属牺牲人员共有73位。在国民党反动派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围剿”战争中，“徐家军”牺牲的人员有：徐文朗，时年29岁；徐安仁，时年59岁；徐楚章，时年51岁；徐玉堂，时年23岁；徐楚齐，时年30岁；徐楚桥，时年30岁；徐忠德，时年25岁；徐忠吉，时年28岁；徐占松，时年22岁；徐少清，时年24岁；黄明文，时年41岁；吴先根，时年27岁；吴正金，时年19岁；吴兴安，时年18岁……

“徐家军”的战斗经历不仅是一部铁血的战斗历史，更是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革命英烈是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受人尊敬



1958年徐海东回家乡在徐家烈士墓前合影

和怀念。在徐海东的家乡大悟县，还有大批类似“徐家军”一样的无名英雄，他们为革命大多数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同样镌刻在“光荣流血”这座历史丰碑上，他们的崇高革命精神同样激励着大别山的儿女们乘风破浪、奋勇前行！

刘祖书，大悟县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徐光思，大悟县老促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一份政协提案，预警 98 年特大洪水

◇ 刘予伟

人物名片：刘予伟，第九、十届湖北省政协委员，第十一届江岸区政协委员，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江岸区政协常委，长江水利委水文局高级工程师。

我当了 25 年武汉市江岸区政协委员，10 年湖北省政协委员，其间提交的提案超过 100 件，但最使我难忘的是成为政协委员后的第一份提案。这份政协提案，预警了 1998 年特大洪水灾害，为当年武汉抗洪救灾作出了贡献。

一份荣誉，委员身份带来新的思考

我 1959 年生于武汉，1977 年高中毕业，恢复高考后考入武汉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

学）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专业。1982 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水文局（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负责做全国第一次“长江流域”“西南诸河”“浙闽台诸河”的水资源调查及评价工作。

当时全国分十大片进行，我们单位负责三大片的水资源调查及评价，而我负责其中的地下水资源部分。全局主要的日常工作是对河流，主要是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的水位、流量、水质、泥沙、河道变化的观测以及对来水（上游来水量和降水量）的预测。多年来，我的本职工作就是长期和水文、水利打交道。

1997 年底，我当选为江岸区第十一届政协委员。作为一名政协“新兵”，当时的我可以对政协委员要做的工作一无所知，

对政协委员的责任和义务也不甚了解，不知怎样履行政协的三大职能，特别是不知如何写提案。

政协委员是一份荣誉，不是徒有虚名的“荣誉称号”。委员们都不是专职的，有很多工作、很多提案都需要在本职工作之外的时间完成。如果缺乏这种自我奉献的精神，在工作中就不可能发挥好主观能动性，也不可能自觉地履行好义务和行使好权利。政协委员是一项工作，一种职能，一副光荣而又责任重大的担子，能否挑起这副担子就全凭我们每个委员的自觉性，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了。

为了尽快适应政协工作，我积极参加政协全会、专委会的对口通报会、专题视察以及专门为新委员举办的培训班等活动，并虚心向老委员学习。业余时间认真自学有关政协章程和提案工作细则、政协委员手册等文件和材料，以此来武装思想，为自己能尽快进入角色，完成组织赋予的使命做好理论上的准备。

但怎样才能给政府职能部门提供有价值的提案和建议呢？我认为只有紧密联系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工作中细心观察，结合当前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来思考，并提出解决办法，才具有可行性。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作为专业人员，对本专业的发展现状和问题了解较多较深，看问题就会看到本质，不会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那么提出的问题就

不会肤浅，建议的解决办法也会切合实际。我是搞水文的，长江每年都有汛期，江岸区又在长江干流边，就在想水文工作怎样结合区里工作实际，能否在防汛方面出点主意？带着这些问题，我一直在进行思考和准备。

一份责任，立足本职提出防汛提案

参加1998年江岸区政协十一届一次全会后，为了能提出高质量的提案，我随即拜访了民盟基层主委、长江科学院副总工程师和我局水文预报处处长、总工程师、中长期预报科科长等人员，探讨并学习了气象和水情预报的相关知识。

通过他们，我了解到中长期水情预报干扰因素太多，时间越长越不准，并且从4月初才开始为决策者提供预报。而早在1998年3月11日的“长江水雨情通报”中，列出了江南地区长达10天（3月1日—11日）的降雨过程，其间时有大范围大暴雨。

从气候角度看，3月上旬的主要雨带位



刘予伟在三峡大坝上

置应在华南地区，但这次降水过程的主雨带位置明显偏北，且降雨强度和范围较大，为明显的异常现象。通报中还对环流形势上分析了多雨的原因，造成湘、赣两江水位陡涨的直接原因是3月4、7、8、9日在湘赣交界处出现的大范围大到暴雨。

另外从水情上分析，3月上旬，因洞庭湖四水及鄱阳湖的三江同时来水，导致长江中游干流螺山—九江段出现了历年同期少见的高水位。在洞庭湖来水汇入的同时，又加上鄱阳湖来水的顶托，使汉口水位8日8时—9日8时涨了0.52米，9日8时—10日8时日涨幅达0.97米，10日8时—11日8时涨幅也达0.88米，汉口水位三天内上涨2.37米。这种情况出现在3月上旬实属罕见。3月16日，武汉关水位达21.23米，位居历史枯季第二高水位。

在3月18日“1998年汛期长江流域水气象预报”的讨论稿中，依据80年代以来整个流域的背景分析、前期天气气候特征与水情特征、前期环流特征分析、北太平洋海温场特征分析、青藏高原热状况分析等方面分析了当年洪水偏大的可能性。3月19日《长江日报》头版也以《底水偏高，连续降雨，长江春汛提前——武汉关水位出现历史同期第二高》为题进行了报道。

在收集到上述资料 and 进行充分调研后，我预感这么多异常情况集中到一起不可忽视，很可能出现汛期水位、水量的异常，也就是说1998年可能发生大洪水。于是，4月2日，我在家中撰写了题为《有关部门应作好今年的防洪准备工作》提案，全文不过400多字，简明扼要地说明了长江可能发生大洪水的原因以及准备措施：

近来，长江水位一涨再涨，武汉关水位在元月10日—20日上涨两米达18.85米，

创13年来枯水位的最高记录。3月份以来，由于洞庭湖来水汇入长江的同时又加上鄱阳湖来水的顶托，使得长江（武汉段）9日、10日、11日三天内水位上涨2.37米，位居历史同期第二高水位，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的专家们分析，是一种影响全球的热力—动力变异的自然现象，被称为“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该现象自1997年4月生成以来已给全球广大地区造成严重的自然灾害，是近50年来最强的一次。据此，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打破常规，提前做好防早汛、防大汛的准备：

（一）成立领导指挥机构，负责贯彻执行上级的指令以及协调在防汛中各部门间的关系。

（二）对辖区内的江堤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三）作好防汛物资的准备、人力调配方案，另外还要准备一支机动的、有专家参加的快速反应队伍，以适应紧急情况的需要。

（四）加强与水情预报部门的联系，以便提前知晓水情变化，打有准备之仗。

提案交到江岸区政协后，引起了充分重视，提案委员会的同志们特事特办，很快就立案、督办。4月29日，区政协主席带队到城建委和防汛办视察堤防建设，并组织座谈。随后区政协副主席、提案委主任蔡顺松又陪同朱毅区长、唐昌海副区长等领导视察了谏家矶西堤等主要险段。

6月8日，区防汛指挥部就我那件编号为113号的提案作出回复，提出做了五个方面的应对工作：（一）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做好打大仗、恶仗的准备；（二）对辖区堤防进行了“拉网式”徒步检查；（三）汛前



1998年9月22日《长江日报》报道内容

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刘予伟防汛提案一字千金》报道。

如今看来这份提案的重要价值已被事实检验，但当初的我并没有想到，一件提案竟会引起那么多领导的重视和社会广泛关注。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性和政协委员的独特价值。

政协委员的优势就在于，我们可站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

各项物资到位，通讯畅通；（四）组建了防汛抢险队伍；（五）区防汛办按照市防汛办的要求进入24小时值班。

区有关部门还表示，我区防汛工作已进入戒备状态，各级、各部门已做好临战准备。我们将发扬团结奋斗、顽强拼搏的防汛精神，为全面夺取防汛抗洪的胜利而奋斗。

一份提案，彰显政协委员的价值

不出所料，1998年武汉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我又根据自己的专业优势，每天提前为江岸区提供水文资料，供防汛办参阅。在超高水位期间，由于江岸区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各项准备工作提前到位，当特大洪水来临时没有发生重大人员伤亡和堤防事故，被评为省立功单位。

8月31日，我参加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工作组赴洪湖参加防汛，9月20日防汛结束回到武汉。21日《长江日报》记者就采访了我，22日《长江日报》头版刊

党派，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政协委员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写提案，提案除反映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外，还应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给政府出谋献策，提合理化建议。

因此，我们政协委员应该更多地关心和支持政府的工作，结合本职工作参政议政，不断提高提案的质量，当好参谋，为政府分忧，无愧政协委员的荣誉，不负政协委员的责任和担当。

做社会治理的法治护航者

◇ 陈 昊

人物名片：陈昊，市政协常委，市新联会监事，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武汉，一座在晨雾中苏醒、在夕阳下闪耀的城市，两江交汇处翻涌的波涛与两岸繁忙的码头，构成了其独特的风景线。江面上穿梭的船只，沿岸熙熙攘攘的人流，无不透露着武汉人骨子里的热情与干劲，以及在岁月磨砺下沉淀的那份沉稳和内敛。我的生命，就像一颗不起眼的种子，悄悄在这片土地上萌芽，汲取着城市的文化养分，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

生长于武汉，确立人生航向

我的童年时光，在老汉口的里弄里度过，雨后狭窄的街道上，不论是自行车还是

三轮车碾过的泥泞，都流淌着过往行人的足迹与岁月的故事。邻里间的家长里短，是那么真实而又充满温度，这些经历都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对人性的理解和对生活的热爱。

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与发展的关键时期，那是一个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织的年代。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有幸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遇到了杨老师，一位用实际行动诠释“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教育工作者。他不仅是一位全国劳动模范，更是我们心中那盏指路的明灯，照亮了我们青春期迷茫的心灵路径。

杨老师是我初一的班主任，他要求我们每天写日记，以培养我们观察生活、抒发感悟的习惯，正是这个习惯悄然打开了我内心深处的感知之门。每日一记，起初或许只是机械式地应付，但随着时间推移，它逐渐

成为一种自我对话的方式，让我们学会反思与自我提升。

对于我不时冒头的突发奇想，杨老师并没有简单否定我的“谬论”，而是耐心引导，教会了我如何在尊重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见解。尽管当时还是十三四岁的少年郎，杨老师也鼓励我们独立思考，不盲目跟随。在学会跳出盲从权威的框架之后，顿觉天地宽，学生时代的烙印至今还影响着我。

这种难能可贵的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让我在后来的律师生涯中受益匪浅。在从事律师工作时，不可避免地需要与法官、检察官、对方当事人进行沟通交流，我们团队内部也经常就某一法律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但正是这种思想的碰撞，才能让彼此的观点在冲突中共存，最终达成一个合理有序并且共赢的局面。

时光荏苒，曾经的少年梦，虽未能完全按照预设的剧本上演，却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实现。我曾梦想成为教育部部长，初衷是希望能够从制度层面推动教育的进步，让更多孩子受益。虽然最终我并未直接走上预想的那条道路，但现在作为市政协委员，我依然能够为教育事业的进步献计献策，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圆梦？

如今，我站在人生的另一个维度，回首望去，那颗由杨老师亲手播下的种子，已经成长起来。我深知，每个人的成长路径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正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那些关键时刻的指引，共同织就了我们丰富而多彩的人生图景，让我时刻以武汉人特有的坚韧与热情，在法律这条道路上不断前行，用知识的光芒照亮前路，用人文的情怀温暖人心，为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投身于法律，践行法治思维

过往的经历促使我选择成为一名律师，同样是笔刀纸戈、唇枪舌剑，律师的身份给了我更多地深入社情为群众利益建言献策的机遇。对于法律，我主要从事两个专门领域，行政法和破产法。

在行政法领域，面对数百起行政诉讼以及行政复议案件，我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案件中，大量的与法律服务相关的案件时刻警醒着我作为一个法律人追求大义的节奏，要沉稳而厚重，也锤炼了我迅速应对复杂情况的执行力。

自2014年起，我作为律师代表参与涉法涉诉案件的信访接待。信访其实是一种很有智慧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可以跳出固有框架的窠臼，峰回路转地把问题解决。但另一方面，我坚信我们目前的行政争议化解机制应从“大信访、中诉讼、小复议”调整到“大复议、中诉讼、小信访”的结构来。法治社会的运行不能离开各种机制的运用，但是怎么用活用好，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法律人特别是行政法领域的法律人应当探索和考量的。

在政府的立法项目中，我也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不论是重要规范性文件的起草还是最终的备案审查，我都深入其中，确保每项政策与法规的出台都能坚实地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对于重大的行政决策，我也是保持着审慎的态度，用自己的专业和用心，确保决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作为行政机关的法律顾问和代理人参加诉讼和复议时，我始终秉持着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心态，凭借着高度的责任心和敏锐的策略思维，绝对不会为了平息一时之风波而

绥靖，在确保合法的私权得到维护的前提下，始终致力于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政府的权威。

面对重大突发性、群众性公共事件时，我的专业知识能够成为政府依法行政、妥善解决纠纷的有力支撑。但更多的时候我是清醒地认识到，我是来自群众，具有专业知识，是群众可以信赖依靠的桥梁。我不仅是一名法律从业者，更是可以连接政府与民众之间信任与公正的纽带，我致力于以法律为舟，导航社会航船平稳前行。

在破产领域，我先后负责了多家企业的破产清算与重整工作。这些企业无一不是曾经民营经济的佼佼者，看着他们在我的手中如蝴蝶临冬一般凋零或者如凤凰浴火一般重生，是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法律人身份要求我时刻保持理性，但触碰到这些企业的创业历程很难不让我感性。这种矛盾交织让我时刻提醒自己，作为管理人，保障各方的合法利益，竭尽全力方能身心俱安。

在负责 WG 公司案件中，我与团队一起攻坚克难、创新工作方法，成功追回 WG 公司对美国 TPI 公司的约 300 万美元境外债权，开创了武汉市破产管理人向境外债务人追偿的先河，总算没有辜负债权人对我们的期许，也代表武汉破产管理人打响了境外追偿第一枪。

在办理这一系列破产案件以及组织研讨中，我们团队加速成长，获取了非常丰富的经验。破产管理人的权利来源于法院，但是在处理破产企业的过程中，是以管理人、律师的身份与政府各部门进行协调的，因此如何调和法院、政府、破产企业、债权人之



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为陈昊委员工作室授牌

间的关系，是所有管理人不可避免的一道必答题。

我也在答完这道必答题后，趁热打铁，拿出了我作为政协委员的敏感嗅觉，将此过程形成了《关于尽早建立政府法院联动机制、加快处置“僵尸企业”的建议》这一提案。

献策在政协，秉持奉献之心

根据相关调查研究，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为 3—5 年，很多公司进入市场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大浪淘沙，不得不在经济浪潮中遗憾谢幕。对于这些急流勇退的企业，如果不启动退出机制，我们的经济市场上将存在大量的沉船遗骸，会给我们的经济制度带来很大的隐患。

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中国经济规划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次会议中特别强调了破产法律制度的完善，强调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建设和执行力度，确保破产程序公正、高效运行。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简化破产程序，降低企业退出成本，同时保护

债权人和员工的合法权益，避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虽然说起来很轻松，但一个制度的建立到完善是非常漫长的历程。正是以此为契机，我在2019年1月政协武汉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期间，结合我们在办理破产案件时碰到的疑难杂症以及顽瘴痼疾，正式提出了《关于尽早建立政府法院联动机制、加快处置“僵尸企业”的建议》，这是湖北省范围内首个关于“僵尸企业”处置问题的政协提案。

从法律专业角度而言，武汉市在处置“僵尸企业”的前端是做得相当不错的，但在末端跟全国其他优秀省市比较起来尚有一定的差距。这个差距在于法院在处置僵尸企业的过程当中，它必然要跟若干个政府部门打交道，比如说税务、公安、工商、房产等，但这些行政机关并不隶属于法院，所以有时就会出现配合偏差，以致法院在具体处置“僵尸企业”的时候会难度较大。

因此，我认为需要党委来进行领导，政府来建立机制，把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涉及的各个行政机关同法院一起形成联动。具体来说，以政府作为主导，来牵头把法院及各相关行政部门联合起来，成立协调小组，以小组的名义推动解决在处置僵尸企业中现实存在的问题。关于联动机制，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有相关成熟经验可资借鉴。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提案的提出，迅速获得了积极的响应，相关府院联动机制应运而生。2019年4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成立武汉市破产工作府院联动领导小组的通知，集合了武汉市党政机关以及各职能部门、金融机构、能源公司，积极推动“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作。

2019年底，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与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印发了《关于破产及强制清算企业注销有关问题的会商纪要》；2021年初，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与武汉市税务局联合发布了《关于企业破产处置中涉税事项办理的实施意见》。我也非常荣幸地因为这一提案荣获2019年度湖北省律师行业律师参政议政突出贡献奖。

2020年11月26日，我作为市政协优秀委员代表，接受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为陈昊委员工作室授牌。在委员工作室成立之后，由于固定了委员履职办公地点，我可以理直气壮地采取“请进来”的方式，请社区工作人员到委员会办公室来座谈。“请进来”的方式互动性更强，到工作室之后对政协委员的身份及履职特点更为了解。现在委员工作室设在永清街道吉林社区之中，我每周坚持下沉社区，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协助基层化解纠纷矛盾，充分发挥了“委员工作室”作为打通民意的最后一公里的渠道作用。

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始终秉持着真诚与奉献之心，致力于为人民群众办实事，为企业破除障碍、解难题，向政府积极建言献策，让我的专业知识与社会责任紧密相连，发挥其最大价值。

在这条服务公众、助力发展的道路上，我也会更加谦逊，不断学习，跟街坊们取经，倾听企业的呼声，代表我们无党派人士界别和群众利益，通过政协平台，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事务，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做心脏守护者，为生命创可能

◇ 陈松（口述） 闻夕（整理）

人物名片：陈松，武汉市南通商会副会长，武汉唯柯医疗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心力衰竭作为心脏疾病发展的终末阶段，其治疗和管理一直是临床医学的难点，且患者数量庞大，全球范围内的心衰患者总量超过六千万人。这一庞大的患者群体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医疗挑战，也推动了心力衰竭相关市场的快速发展。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Report Linker 的数据，心力衰竭相关市场规模预计将在 2025

年达到 140 亿美元，这显示了该领域的巨大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然而，尽管市场前景广阔，但关键技术和尖端产品长期被海外巨头所把持，这使得国内企业在该领域的竞争中面临不小的挑战。

我们立足光谷，创立的武汉唯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制造加速突围，成为华中地区唯一一家三类高风险心脏植入器械研发生产企业。成立仅有 6 年，公司的 5 款核心产品已经获批，其中 2 款产品填补了国产空白，一路成长为光谷瞪羚、湖北金种子、潜在独角兽企业。

产学研搭配，诞生“黄金三角”创业团队

创业一定要人和，人不和一定创不成。

我是江苏南通人，学的是机械专业，毕业后到上海舅舅创办的医疗器械公司负责研发工作。该公司从一家创业公司慢慢发展成行业的独角兽，我也获得了很多技术和管理经验。后期因发展所需公司被乐普医疗收购，那时我已有了选择躺平过安逸生活的条件，但又不甘心。所以一直在寻找项目合作机会，想自己打造一家现代化的企业。

在医疗领域的这些年，我有幸结识了一些优秀且同频的人，比如尚小珂和王雪丽。

尚小珂是陕西人，华中科技大学本科毕业，武汉大学医学硕士和博士，在武汉生活了20多年。王雪丽是天津人，任职世界500强医疗器械企业，主要负责高风险类植入人体的三类医疗器械注册申报工作，在专业领域里我们是互补的关系。



唯柯医疗“黄金三角”创业团队(从左到右为陈松、尚小珂、王雪丽)

我们三人经常在一起交流结构性心脏病介入器械的发展，也萌生过一起创业的想法。不过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在各自领域还没有足够影响力，创业想法便搁置了。

搁置并不代表放弃，而是准备好后再出发。十年后，尚小珂已在武汉协和医院心外科工作，成为国内顶尖心外科介入医生，有上万例心脏介入手术经验，多次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奖及中国十大心外科优秀青年医师奖、中华医学会厄尔·巴肯奖等多个行业内至高荣誉。王雪丽则主导了十余个三类医疗器械产品的注册拿证，我也积累了更丰富的心血管植入器械研发经验。

我们三个外乡人在武汉相聚，组成产学研“黄金三角”创业团队。尚小珂在武汉有着丰富的临床医疗资源，大量病例数据样本和临床经验可帮助研发团队精准找准方向，缩短研发时间。王雪丽将世界500强企业管理模式带入，丰富的医疗注册经验能让我们少走弯路。我则专注于医疗器械的研发。我们发挥各自优势、各司其职、各管一方，这是公司发展较为顺利的核心因素。

我们选择在武汉创业，是基于对武汉这座城市的信心。特别是光谷，这里有资源，有厂房，有配套的基础设施，以及相对应的支持政策和政府补贴，为初创期的我们提供了有力支持。

武汉最吸引我们的是丰富的高校资源和人才优势。人是企业创造价值的主要驱动力，所以在人才的选择上我们精益求精。

创始团队里硕导和博导占到 2/3，现有员工 100 余人，其中研发人员 30 多人，多是硕士以上学历。

确定目标，做好心脏的守护者

2018 年 7 月，唯柯医疗在生物医药产业氛围浓厚的武汉光谷注册成立，专注于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结构性心脏病领域心脏植入器械创新发展。选择研发的首款产品便是“卵圆孔未闭封堵器”。

心脏房间隔上有一个自然通道叫卵圆孔，它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负责供应心脏血液。然而，在婴儿出生后，这个通道通常会自然关闭。如果卵圆孔在年龄超过 3 岁后仍未闭合，这种情况被称为“卵圆孔未闭”（PFO）。卵圆孔未闭通常理解为心血管结构异常，发病率高，也是成年人中最常见的

先天性心脏异常之一，约 1/4 的成年人都患有此病。

大多数患者无症状，但其存在对健康或寿命有潜在危险。在特定情况下，会导致一系列临床症状，包括偏头痛、缺血性脑卒中、心肌梗死、外周血管栓塞、减压综合征等。研究显示，存在卵圆孔未闭的人群发生脑卒中、偏头痛等风险较正常人群呈数倍升高，而脑卒中、偏头痛等人群患此病的概率也高于一般人群。

为了有效应对这些问题，经皮介入封堵卵圆孔已成为一种推荐的治疗方法，旨在预防脑卒中事件的复发和减轻偏头痛的发作。

我们之所以选择从封堵器做起，一方面因为这款产品临床需求高，我国每年新增患者约 10 万例；另外一方面封堵器的技术相对成熟，国内外的产品市面上都有，被应



全国首例动脉高压患者心房分流器植入术在武汉成功实施（右一为陈松）

用和接受程度较高，创业风险相对较小。但封堵器的技术仍有待提升，比如适应性和安全性等方面，一些患者植入封堵器后，容易形成血栓等情况。

真正能够改变技术的应该是器械，只有器械的变革才能引起技术的变革。医生技术再好，没有好的器械，就不能形成相辅相成的作用。

针对这一痛点，唯柯医疗立志做一个真正符合患者临床需求的封堵器。我们通过金属切割编织技术，很快研发出“新一代纳米膜卵圆孔未闭封堵器”。临床数据显示，与国内现有的封堵器相比，该款产品能有效减少血栓风险，且毒性等副作用更小。

创业当年，尚小珂携该款封堵器参加了光谷 3551 国际创业大赛，获得当年大赛的二等奖和最佳人气奖。次年，唯柯医疗获得比邻星创投千万元 A 轮投资。此后连获 2 轮融资，3 年内就成长为湖北省“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

从零开始，研发出全国首款心房分流器

唯柯医疗要想在结构性心脏病领域成为创新性的企业，还应有更具典型性的创新产品，公司的封堵器产品只能算是“升级换代”，而不是首创性产品。

结构性心脏病包含先心病、心脏瓣膜病、心力衰竭等，其中，心脏瓣膜病和心力



武汉唯柯卵圆孔未闭封堵器生产车间

衰竭，近年来患者增长较多。特别是心力衰竭，是心脏疾病发展的终末阶段，又被称为“心血管疾病最后的战场”。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心衰患者超过 1200 万，且以每年新发约 300 万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尽管国外市面上已有相关产品，但国内产品还处于“从 0 到 1”的状态。

在此背景下，我们以治疗先心病的封堵器为基础，围绕心脏瓣膜病和心力衰竭进行了产品布局：自主研发了“D-shant 心房分流器”，这是国内第一款心房分流器产品，是一款从无到有的医疗器械产品，没有任何参照。每一个细微调整，我都经过了无数次反复的实验。

从 2018 年起步，“D-shant 心房分流器”的研发历时一年，从原材料的选型、编织、热处理再到加工，整体工艺工序超过 30 道。其中，仅在“如何维持孔径稳定性与顺应性之间的平衡”这一个难题上，我就带领研发团队设计出了 10 余种方案，历经几十个不眠昼夜、上百次结构的改进，最终通过改进

编织工艺增强产品腰部支撑力，单侧偏心铆钉设计实现了产品的可回收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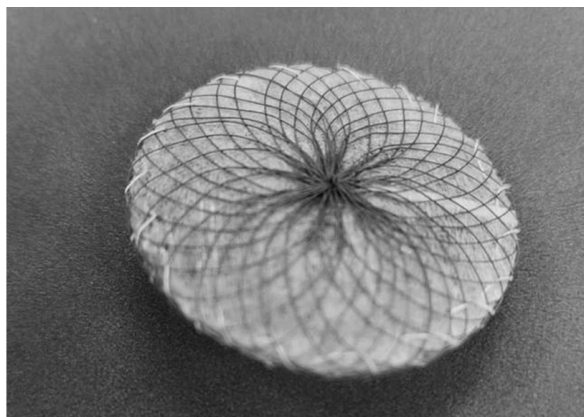
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可回收、可二次干预的分流装置，也就是说，在术后任何时间点，一旦患者的血流动力出现问题，仍然可以通过微创把这个装置取出来。这是一种“有退路”的治疗方式，成本也远低于传统心衰器械，因此该产品同时获得了中美两国突破性设备的认证。

我们自研经导管介入瓣膜，设计之初，我们不断优化生物材料与镍钛合金支架的缝合工艺。每一处“针脚”如何落，每一条“丝线”怎样缝，都经过了上百次试验，直到达成完美方案。独有的大尺寸型号能为更多大瓣环病患提供治疗机会，国内外市场尚无同类产品获批。极深的技术和工艺护城河，还让产品及材料入围了工信部第一批生物医用材料揭榜挂帅创新任务和科技部高端功能与智能材料重点研发项目计划。

产品设计完成了，如何批量生产成为我的一个新挑战。医疗产品关联着人的生命安全，产品必须做到零失误。这款产品的所有缝合工艺都需要人工来完成，然而，即使是最熟练的工人缝制一枚介入瓣膜也需要用时近6个小时。这些是机器无法替代的，从一开始，我们就要培养工人。

招募人才之路确实坎坷重重，尤其是在武汉乃至华中地区，微创介入医疗器械与三类高风险植入器械领域的专业人才稀缺，让我们难以直接获取现成的人力资源。面对这一挑战，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更远的上海、苏州等地，精心引进一批经验丰富的人才，并采用“师徒传承，以老带新”的独特培养模式，逐步构建起一支技艺精湛的工人队伍。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不懈努力，唯柯



武汉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卵圆孔未闭封堵器样品

医疗已从无到有，实现了产品从概念到原型，再到规模化生产的华丽蜕变。如今，在我们的生产车间内，二十余名技艺高超的“工匠”正如同细腻的“绣娘”，全神贯注地投入到精细缝制牛心包切片中，每一针每一线都蕴含着对品质的极致追求。随着针线的翻飞，一件件承载着生命希望的生物瓣膜产品缓缓走下生产线，标志着唯柯医疗在批量生产领域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020年4月，“D-shant 心房分流器”完成中国首例人体植入，标志着中国在这一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2022年2月新一代卵圆孔未闭封堵器在国家药监局获批注册，2023年6月已经完成全部植入病人的入组与随访，即将向国药监提交注册申请，2023年12月唯科医疗的经股主动脉反流介入瓣膜启动正式大规模随机临床试验。

医疗器械产品的开发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在无数的障碍、挫折面前，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创新、尝试和坚持。

我的老师陈潭秋琐忆

◇ 江定仙（遗作）

陈潭秋烈士是我的小学老师，又是我们家的座上客。1919年同我父亲江家瑞（1887—1962，生前任武汉市政府文史馆馆长）在武昌高师同年毕业。虽然他在英文系，我父亲在数理系，但听说在校就是亲密好友，来往较多。后来，两人一同在武昌高师附小教书，因我们家住在学校附近，他和徐全直（1925年二人结婚）经常在我们家玩、吃饭。他的弟弟“八先生”（陈有林）和徐全直的妹妹徐全勇也有时一起来。他很健谈，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记得还留过髭。

大革命时期，我们全家都受陈潭秋的影响而参加了革命。我父亲入党也是他介绍的。我哥哥定位和我都是“红小鬼”，同他



陈潭秋



江家瑞

也有接触。现将我能记得的有关事迹写在下面，仅供参考。

大约 1924 年，我在武昌高师附小读四年级，陈潭秋是我们的班主任，教过英文。他讲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如何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世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印象。

1926 年秋，北伐军快打到武汉，武昌关城门。军阀萧耀南因为前方节节失败，狗急跳墙声言要捕杀共产党人。不久，有一位共产党人被杀，老师要我们去看，看了回来将情况告诉他。这位烈士名叫陈定一，军阀将他的头高高挂在武昌最热闹的司门口向群众示威，可是烈士的脖子挺直，脸上充满怒气。我们把这些见到的都告诉了老师，他听了很义愤。

不久，北伐军先头部队在汀泗桥击败军阀吴佩孚，打到武昌城外。军阀萧耀南、陈嘉谟匆忙死守，我们都被关在城内。我家住北城角，住房在城墙边，被守城的大兵占去了，只好搬到小学校里去住。我记得我们住在一个大课室，与老师全家一起合住。我们都睡在地板上，电灯线放得很长很低。老

师说要防止打炮，灯放低些可以避免灯光暴露目标。有一次，老师叫我找一瓶碘酒来，找到后看见他拆开一封来信，上有用毛笔写的很稀疏的文字，他在行间都涂上碘酒后才显露出来。我虽不知信里写的什么，但知道他胸有成竹，在地下指挥战斗。

关城以后，开始两家一起吃饭，后来老师不同意，说我们家人多不方便。因为他们上街不方便，我母亲总是尽力帮着张罗。后来粮食越来越紧张，买不到米，只能买藕或者其他可以充饥的食物。剩下的粮食改成做稀粥，还要买瓜菜补充，直至挖野菜吃。

这时候，红十字会组织救济难民，每天从汉口派两条船来运送难民出城。我们兄弟才十四五岁，由老师和我父母亲商量，让我们去试试“挤城”。当时挤城的人很多而城门很小，反动士兵随时抽打示威，人们忽进忽退，挤踩而死的不少，尤其是妇女老人和小孩。我们去挤过两次，冒了很大风险，挨了不少打才算挤上了船。船先到汉阳鹦鹉洲靠岸，下船自己想法子乘划子到汉口。记得那天风浪很大，同船的有龚啸云、徐全勇及蔡以忱夫妇，冒着危险到达汉口。



江定仙



1930年代家庭合影，前排左二江家瑞，后排右二江定位（江伯素），右四江定仙

北伐军打开武昌城后，老师就忙了，我们很少见到他的面。只记得蒋介石“四·一二”叛变以后，党中央在武昌高师附小举行会议（现在想来是五大），由老师推荐我们这些“小鬼”到会作服务工作，送水、分发文件等。从此，我在武汉便没再见到他。

1928年，我随父亲出走到上海。当年秋天一个晚上，老师到我们住处上海哈同路民厚里来看我父亲。他知道我开始学音乐，新学了一点小提琴，一定要我拉给他听听。我站在凉台上用弱音器拉了贝多芬的G大调小步舞曲，他勉励我努力学习将来为人民服务。他又同我们全家到北四川路海宁路一家演苏联片的电影院去看了《船夫曲》。当时只有无声电影，歌曲是由白俄歌唱家现场唱的，他很欣赏这首歌。

大约1932年，我上大学时家住在赫德路正明里18号，隔壁是潘一如先生，他爱

人忽然带来一个婴儿，听说是老师的老三（即陈志远）。后来吴德峰、戚元德说，徐全直在南京牺牲了。

抗战期间，老师的大女儿赤军（化名）在恩施读中学，我父亲在李四光办的湖北科学馆工作，暗地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后来听说有人知道了赤军的来历，又暗中帮助将她转移到四川白沙女师学院读书。1942年以后，老师的第二个孩子平平在重庆青木关中大附中读书，董老托人让我父亲暗中照顾。

江定仙（1912-2000），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生前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

中共中央机关在武汉时的邓中夏

◇ 杨波 杨军

1927年4月到8月，时逢中共中央机关在武汉，邓中夏参与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从筹备中共五大到参加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从参与策划南昌起义到参加八七会议，面对日益严峻的中国革命形势，作出很大努力，发表许多意见，提出对革命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观点，力图挽救革命危机，促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出席五大，批判右倾机会主义

党的四大以后，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北伐战争顺利进展，从根本上打

击了北洋军阀势力。北伐军所经之处，农民运动开始高涨起来，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

然而，在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各种政治势力也在迅速发生变化。随着“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发生和“戴季陶主义”出笼，国民党内部新老右派开始合流，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可是，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占主导地位，对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步步退让、妥协的政策。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从广州迁至武汉。3日，邓中夏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邓中夏

会议，提出全总机关继续驻在广州已经不能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建议迁址武汉。

2月11日，全总机关正式迁址武汉，办公地点设在汉口歆生路（今江汉路）义成里华杨旅馆，不久迁往友谊街16号。3月下旬，邓中夏与陈延年、区梦觉等率中共广东省代表团离开广州北上，来武汉筹备即将召开党的五大。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至汉口。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遭到残酷镇压，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被解除，全总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及其所属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州办事处、香港总工会等全部被查封。仅仅7天2100人被捕，其中共产党员约600人，被秘密杀害者100余人，李启汉（李森）、萧楚女、邓培、熊雄等英勇就义。

邓中夏悲痛不已，挥泪写下《无产阶级英勇战士李森同志的牺牲》以示悼念。

中共中央为挽救革命，亟需召开会议，以制定新的路线和对敌斗争方针。

4月22日至26日，邓中夏出席中共中央全会。全会讨论确定党的五大议事日程，决定组成政治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和秘书处。职工运动委员会由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郭亮、李震瀛等9人组成，邓中夏兼任秘书。

4月27日至5月9日，五大在武昌召开，分析了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的政治形势，回顾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过程，指出了党在统一战线中忽略这个斗争，以及过去忽视或不重视土地问题和乡村民主政权的错误。

会上，邓中夏与其他代表一起总结斗争经验教训，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他列举法国革命和俄国二月革命中资产阶级当权人对无产阶级及革命群众的镇压和残杀，引证中国“五卅运动”中“不正是资产阶级勾结军阀和帝国主义出卖工人阶级？”要求彻底清除右倾投降路线，立即武装工农群众。

五大选出了由31名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邓中夏当选为中央委员。

参加全国劳动大会，批驳“工农运动过火”

鉴于革命形势日益紧迫，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为应对武汉国民政府越来越明显的反动倾向及压制工农运动的举措，确定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任务，中共中央6月19日在汉口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

6月18日，邓中夏出席大会预备会时，就强调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领导作用及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他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担任组织委员会、教育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各地产业工会决议审查委员会委员，负责领导起草《组织决议案》《教育宣传决议案》，参与《大会政治报告》《大会宣言》《政治决议案》等文件的起草。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开幕，邓中夏多次主持会议并多次发言，严厉批驳所谓“工农运动过火”论，指出“工农运动没有过火，是反革命太过火了！”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问题，邓中夏指出：“既绝不是纯资产阶级政权，现时亦不是纯无产阶级政权，他有他自己的第三个形式。第三种形式政权是什么呢？革命的胜利，必然建立一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主义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将一切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在一块，一方面要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另一方面继续反帝国主义的奋斗，成一个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权。这个联合政权的建立，使革命不落在资产阶级领导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在无产阶级领导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以达到中国革命之完全胜利。”

大会分析了革命的危急形势，声讨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宣布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

等反革命联盟的斗争中，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都将坚持到底的决心和方针。

参加八七会议，支持发动武装反抗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停止陈独秀的职务。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随后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疯狂的逮捕、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7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邓中夏出席，会议决定了“土地革命”和“民众武装革命的新政策”，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总部署。中央指派



汉口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

邓中夏、李立三等人赴九江实地考察形势，为中央进一步决策提供依据。

7月19日，邓中夏与李立三、谭平山等人乘船到达九江，次日在九江海关一间房间召集叶挺、聂荣臻、林伯渠等人举行“九江会议”，在分析当时形势时决定进行一次独立的军事行动。会后，邓中夏与李立三立即赶到庐山与瞿秋白商量，瞿秋白完全赞同。

7月24日，邓中夏、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4人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叶挺、贺龙“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采纳这一意见，同意利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在南昌发动武装暴动，并确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前敌委员会。

7月27日，前委在南昌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决定7月30晚举行暴动。部署完成后，邓中夏返回武汉，筹备中央即将召开的紧急会议。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秘密召开紧急会议，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出席。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为正处于转折关头的中国革命指明了新的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会上，毛泽东尖锐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论断，后来被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邓中夏大力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武装夺取政权的观点，并指出：“以前我们将小资

产阶级看得太低，第五次大会又把小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甚至将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为小资产阶级了，这样还说什么土地革命呢？”基于此，邓中夏强调，“只要有力量，小资产阶级自然要跟我们走的”。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选举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9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7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邓中夏后来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上指出：“如果没有‘八七’，我们的党早已没有了。八七会议救了党，‘八七’是我们党的重要关头。”

8月15日，邓中夏遵照中央的指示，离开汉口抵达上海，接替牺牲了的陈延年担任江苏省委（兼辖福建、浙江、安徽、山东等省党组织）书记，在新的岗位上迎接新的斗争。

杨波，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杨军，湖南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从黄陂大桥到双凤大桥

◇ 程竹怀

别看今天，武汉黄陂淠水河一河两岸四桥飞架；回想昔日，周恩来总理从武汉去麻城视察，得靠乘船渡过淠水河。周总理动议建一座桥方便鄂豫之间的交通，直到1960年7月1日，黄陂才结束淠水河无桥的历史。

淠水河系长江支流，发源于大悟三角山，流经大悟、红安和黄陂三地，全长142.14公里。黄陂段约有90公里，从北向南纵贯全境，阻隔了鲁台镇与城关镇两岸的父老乡亲。

淠水河交通地位十分重要，是武汉通往鄂东、豫南的必经之路，可黄陂境内没有一座桥梁，仅靠摆渡通行，人们出行艰难。1948年5月，因为战时需要，临时搭建过一座浮桥，但只供军队紧急通过。



周恩来总理动议建设的黄陂大桥

黄陂大桥跨前川

1958年11月，周恩来总理从武汉去麻城县（今麻城市）视察，途经黄陂淠水河，河面宽近300米，即使枯水季节也水流湍急，只有一条渡船摆渡。黄陂县委副书记张怡如具体负责安全保障措施。

张怡如幼年读过7年私塾，后进抗日公学受到党的教育熏陶，投身革命队伍，18岁就当上武工队队长。他接到任务后夜不能寐，提前一天物色挑选有经验的老船长，作出周密安排。

张怡如是我父亲、《黄陂县志》编辑程显明的好友，以前常来我家聊天忆旧，我对他进行了采访。

1958年11月17日上午风和日丽，周总理登上渡船后，陪同的张怡如告诉周总理，《千家诗》首篇“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所说的“前川”，就是黄陂城关前川，这首诗是北宋哲学家程颢少年来黄陂求学期间即兴写下的。

周总理观览一河两岸风光兴致很高，指着东岸鲁台山上小亭子问是什么亭子，张怡如回答：“这是为纪念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而修建的双凤亭。这‘双凤亭’三个字是郭老（郭沫若）所题写的。”

周总理渡过淝水河上岸后，对湖北省委及黄陂县委领导说，黄陂是武汉的北门户，扼鄂东北要道，连接安徽、河南，位置十分重要，可这么大一条河却没有一座桥梁，怎么行呀？多不方便。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连忙说：“黄陂县里没有钱呀，要修桥需要上级支持。”周总理说：“那就支持呗，桥一定要修，有困难我支持。”

湖北省委领导迅速将修建黄陂大桥的勘测设计任务，交给了省交通厅公路工程局，设计负责人为王开言、吕永泽、杨清琅等人。建桥选址首先考虑利用上游的石嘴处，但该处岩石风化严重，水文条件很差，要拆迁房屋过多，最后确定在乘船渡口上游70米处建桥。

1959年8月，黄陂大桥工程指挥部迅

速成立，技术指导、资金、材料等由省公路工程局第二工程队负责。1959年10月，连接汉（口）小（界岭）公路，位于黄陂县城关（今黄陂区前川街）的黄陂大桥动工了。

黄陂大桥为钢筋混凝土简支T梁结构，桥长300米，桥宽8.4米，行车道宽7米，最大跨径22.2米，桥下垂直净高6米，总投资86.46万元。

1960年7月1日，黄陂大桥通车全城欢腾，乡亲们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挤满了大桥桥面。车辆排着整齐的队伍缓缓通过大桥，五彩缤纷的气球一起飞向天空，人群激动得泪流满面一片欢呼。

双凤大桥展新姿

从1960年到2009年，黄陂人一直走着黄陂大桥。由于大桥建设时资金紧张，没有装路灯，夜里只有摸黑过桥；又因没有划分车道而人、车混流，每天黄陂七中放学时就大堵车。



如今45岁腿脚不便的居民丁新阶对老桥记忆最深，他曾经以开麻木为生，经常等在老桥下边接送南来北往的人。每天早晨，他将赶集的鲁台百姓送到前川，晚上又借着麻木的前灯穿过漆黑的大桥，将人们送回鲁台。住得远的，会拎着大包小包，再转乘巴士回家。在一些良辰吉日，他会看到同时有几队迎亲、接亲的队伍



经过老桥，鲁台的人家都愿意把姑娘嫁过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会新建双凤大桥，大桥上也会灯火辉煌。

黄陂大桥两岸的人们至今还记得：1999年5月4日，武汉市公路管理处发布通知，确定黄陂大桥为危桥，要求对其维修、整治和恢复。修复前大桥封闭，设置危桥标志，采取限行设施，仅供小型车辆和行人通行，大型车辆改行上游兴建的黄陂溇水二桥。

2012年4月，黄陂大桥由黄陂公路管理局路桥工程处开始拆除，通车达50多年的黄陂大桥步入历史，黄陂双凤大桥承担新的使命。

2007年12月21日上午，双凤大桥开工，为当年的黄陂“十大实事”之一。双凤大桥全长940多米，主桥长576.13米，主跨长160米，为连续钢构箱梁，双向4车道，设计行车时速60公里，总投资7641万余元，采用一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的标准设计。

2009年6月18日，在黄陂大桥原址上诞生的双凤大桥建成通车。

大桥旁修建了溇水公园，两百米处是蓝色人行景观桥，对岸是为纪念程颢、程颐

兄弟而修建的二程书院、双凤公园、鲁台双凤亭风景区。

传说程颢、程颐兄弟是其母“夜梦双凤投怀”，生于黄陂城关文教巷，人称“双凤”，因而将黄陂大桥更名为双凤大桥。通车那天，丁新阶满怀喜悦去看通车仪式，新桥又漂亮又宽敞，路灯高高竖立，再也不用担心摸黑和堵车了。

老桥荒滩昔日漆黑夜无灯，新桥两岸今朝风光醉游人。杨柳青青河水静，忽闻岸上踏歌声。晨起漫步溇水边，夜上高桥观灯景。每到夜幕降临，桥上桥下游人如织。桥上大红灯笼高高挂，两旁灯光彩带绕桥梁，恰似星河洒落人间，好一幅锦绣前川迷人的画卷，让人仿佛来到了梦里江南水乡。

程竹怀，湖北省作协会员、《木兰文化报》执行主编

从汉阳造币厂到琴台美术馆

◇ 刘宝森

在美丽的汉阳月湖之畔，琴台美术馆俯瞰如一道道“银色梯田”，无疑是武汉城市文化的新地标。

曾几何时，这一片称作东菜园、西菜园，小小一个地块，从汉阳造币厂、湖北针钉厂、湖北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到湖北荣军学校、湖北假肢厂、武汉假肢技工学校、湖北省聋儿康复中心，浓缩了一段城市变迁史。

汉阳造币厂日铸铜元四百万枚

张之洞上任湖广总督之时，清廷已将中央财政负担的费用（官俸、军费、海防江防经费，洋务开支、新政开支，地方债务等）支出转移到地方，同时允许地方有一定财政

收入。地方督抚在按定额上缴户部库款之后，不仅可以支配余款，还可以在特殊情况下自行增收、减支和挪用库款。

湖北省每年的财政收入，须向中央政府解款约80%，实际可支配的只有110万两，虽然一些新政项目可向清廷协商拨款，仍是远远不够。譬如汉阳铁厂，户部、海署及江南协款加起来，也只能满足39%，大部分得靠湖北地方筹款。况且，张之洞打算兴办的新政项目还很多，于是铸造钱币便成为一大重要收入来源。

张之洞早在两广总督任上，就有铸造银元的计划，因而一任湖北总督便马上付诸实施。1893年，湖北银元局设立，铸造银元5种。1897年，又创官钱局，印钱票、银元票。



琴台美术馆

1901年，将银元局改为铜元局，开始铸印机制铜元，投入机器150部，一个昼夜可出铜元400万枚，居全国之最。

湖北地区设置的第三座制币厂，即汉阳兵工厂的附设铜币厂，也称汉阳造币厂，设在汉阳月湖东菜园、西菜园。1905年开始建厂购机，厂房6幢，拥有熔烘炉等116座、锅炉4座、辗片辊12副、春饼机8架、光边机8架、印花机50架，设备齐全。委候补道兵工厂总办桑宝兼管开铸铜币之事，仅一年就铸当10铜币52754.47万枚，行销无存。中共早期叛徒向忠发，16岁时到该厂工作直至停办。

1905年《财政处奕劻等会户部折——限制各省铜元铸数》载：“至各该局所用铸模，参差不一。前已奏定均须由户部颁领祖模，所有现用各种旧模，就一律即行停铸，拟令各省局于未经颁到祖模之先，一律暂行停铸”。

随后，户部右侍郎陈璧奉命到开封、武昌、南京、清江浦、广州、福州、安庆等地考察铸币厂，调查限制铜元铸印数量。由此，汉阳铜币厂停办，所置铸币机件均归汉阳兵工厂存贮。

湖北针钉厂由南洋侨商接办

1908秋，湖广总督陈夔龙奏称：“近二十年来，中国缝纫、竹木各工，购用外洋针钉，为数甚巨，以致土货行销极少。”若能仿造外洋针钉，“实开民间大利源，万不容畏难苟安，坐任放弃”。

此前，张之洞查明汉阳兵工厂附设铜币厂的房屋空闲，饬改为针钉厂，委派候补道黄厚成与官钱局候补道高松如妥商禀办。黄厚成等与德商瑞生洋行订立购买机器合同，又聘请有3名英国工程师。

1909年5月，湖北针钉厂建成开工，

所购机器共值银 21 万两，安装有造钉机、拉丝机、螺钉机、纸筐机及灯电机件设备等。总督陈夔龙奏准该厂免税 3 年，产品照机器仿制洋货之例，在第一关按值百抽五，完正税一道，此后无论运赴何处概免重征。总办黄厚成申请产品除在鄂境批发外，还在长沙、芜湖、镇江等埠分销。

针钉生产原料依靠汉冶萍钢铁厂转炉供给的钢材，但当钢的碳含量高时，针一钻即脆断，钉一打即脆裂；当钢的碳含低时，针钉又容易弯曲，成吨的针钉毫无收益，导致亏空严重。

1910 年 6 月 5 日，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行开幕典礼，展会历时半年，南洋侨商梁祖禄出 1 万银元承买下 1 号入场券，随后游历湖北武汉，受到各界热忱接待。梁祖禄在访问湖广总督瑞澂时，接下濒于破产的湖北针钉厂，先后投资 10 万元保障圆钉生产。1918 年，中华五金制造公司承租湖北针钉厂，开始试制缝衣钢针。

“湖北高工”培养工业技术骨干

1927 年，武昌甲种工业学校迁至湖北针钉厂，改名为湖北省立第三高中工科，1933 年再改名为湖北省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湖北高工”或“阳高”。学校设有染织、机械、应化、木工四科，其中机械科设有一座金工实习工厂。学制三年，招收初中毕业生或九年制学校毕业生。

1938 年 3 月，面对日军逼近，湖北省政府下令西迁，“湖北高工”先后在宜都红花套、巴东东瀼口、宣恩小关、四川彭水等处办学。抗战胜利后，由校长徐善同带领回到汉阳月湖旧址，但整个校园只剩下清末时建造的围墙和门柱，只得重建校舍。

从 1927 年至 1949 年，“湖北高工”毕业生约有千人，多数成为工业部门的技术骨干。1949 年 9 月，根据湖北省教育厅安排，“湖北高工”与湖北省立高商、女子职业学



两任湖广总督张之洞、陈夔龙，分别创办汉阳造币厂、湖北针钉厂

校合并为湖北省高级职业学校，迁至武昌西卷棚。

湖北荣军学校延续“康复绿洲”

“湖北高工”出后，校址改为湖北荣军学校，随后发展延续为湖北假肢厂、武汉假肢技工学校、湖北省聋儿康复中心，致力于为残疾人服务。

湖北荣军学校接纳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致残的军人，集中学习休养，在1954年出了一位英模人物严中良。

严中良是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战士，因右手被炸断，回国休养时主动参加护理工作，立功两次评为模范，不久进入荣军学校。1954年秋长江大水不息，8月17日，严中良与战友到东湖边上抢收汪在水中的稻谷，遇上运谷船超载漫水即将覆没。他虽不习水性，却率先跳入水中，以减轻船载重量，可由于右手残疾左手又被蛇咬伤，身子急剧下沉。危急之际，他将战友唐清海推出水面获救，自己却献出生命。湖北省委追认他为共产党员，武汉市防汛总指挥部追认他为一等功臣和烈士。

1951年上半年，中南荣军管理局在荣军学校筹建湖北假肢厂，为残废军人承担假肢及辅助器械的制作、装配及维修任务。建厂之初，一无厂房，二无设备，三无技术，白手起家。可在改革开放后，湖北假肢厂与北京假肢厂试制成功的SACH脚、下肢对线调节器等产品，追上了国际水平的换代产品。

1991年，湖北假肢厂办厂40周年之时，已成为全国同行业重点骨干厂家之一，产品多达210多种，年均生产装配量1.7万件以上，吸引缅甸、新加坡、印度、美国、德国等国的侨胞和外国人士来此安装假肢或矫型器。

1987年3月，在湖北假肢厂内征用土地1万平方米，办起民政部为全国培养假肢装配技术工人的第一所技工学校——武汉假肢技工学校。学员来自全国32家假肢厂，设上肢、下肢、矫形器制作与装配等3门专业课。

同期，建起一幢湖北省聋儿康复中心大楼，占地面积17亩，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这是湖北省唯一一所集医疗、康复、教育和科研于一体的残疾儿童福利事业机构，同时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残疾儿童社区康复工作者培训基地合作项目执行单位之一。内设综合部、听力技术服务部、语言训练部、社区康复部、脑瘫弱智康复部等部门，至2002年建立康复点70余个，训练康复残疾儿童近2000余人次，康复后进入普通学校的孩子达800多人。

2004年，东菜园、西菜园开始拆迁，划入月湖文化艺术中心工程范围，矗立起别具一格的琴台美术馆，总建筑面积约4.3万平方米，是国内最大的清水混凝土单体建筑。

琴台美术馆外形，好似连绵起伏的山丘，屋面以略显抽象的等高线阶梯状造型完成，阶梯侧面为银色金属装饰，顶面为白色石子和灌木绿植，蜿蜒曲折的栈道穿行其间，形成极具体验性的景观特征，与周围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已成为游客纷纷前来的网红打卡地。

刘宝森，武汉公交集团退休干部

集家嘴的划子擂倒荡

◇ 田联申

“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清代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描绘当时汉口码头的兴盛和发达。武汉的码头一度多达 200 多处，仅轮渡码头就有数十处。

武汉有句歇后语“集家嘴的划子——擂倒荡（趟）”，比喻做事要抓紧，避免半途而废。直到 1960 年代，从汉口集家嘴过河（汉江）到汉阳高公街，人们还是坐划子——可承载 30 人左右的有舵大木船。集家嘴靠近汉江入长江之处，涨水时节水流湍急，船上两侧的水手必须齐心协力划桨，木船方不会随水流漂往长江。两



岸等着过河的人多，必须“擂倒荡”，划手换班休息，歇人不歇船。

星移斗转，鸟枪换炮，柴油机驱动的轮船代替了木划子，乘客定额 600 人，早上

5点开班，晚上10点35收班，以满足两岸居民的出行需要。进入2000年，连接集家嘴与高公街的晴川桥建成，这条航线完成了历史使命。

集家嘴名称

在历史地图中，集家嘴有多个名称。清末至民国时期，1877年《湖北汉口镇街道图》为集稼嘴，约1890年出版的《武汉城镇合图》为接驾咀；1926年《武汉三镇详图》、1930年《武汉三镇市街实测详图》均为集稼咀。武汉解放后，1949年8月出版的“解放新版”《最近武阳汉市街详图》，“民族路码头”代替了集稼咀码头；1951年《武汉市汉口区马路图》仍沿用集稼咀码头。

在我看到的历史地图中，只有1924年日本人出版的《汉口市街新图》称为“集家嘴码头”，与如今的名称完全一致。

据《汉口丛谈》记载：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朱厚熜从安陆州治所在地今钟祥，经汉水赴京继承皇位曾路经汉口，由此后人把汉水入江口两岸渡口称为“接驾嘴”，汉阳岸又称为“南岸接驾嘴”“南岸嘴”。除“接驾嘴”外，并有鲍家巷（报驾巷）和接驾嘴河街由此而得名。

集家嘴码头

史料记载，集稼嘴码头始建于清乾隆四年（1739），《汉口丛谈》说汉口古有八渡，即宗三庙、五显庙、老官庙、沈家庙、集稼嘴、柯家码头、龙王庙和四官殿。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中“廿里长街八码头”

即指此。

集家嘴渡口自清初以来，一直是商业繁盛之区，沿岸帆樯林立，商旅往来频繁，但此地正处汉水入江的弯道之上，常受洪水威胁。清同治八年（1869）洪水冲刷河岸，居民多受其害；1931年大水时，沿河居民因洪水侵袭而大多毁家丧生。

解放后，集家嘴到硚口之间修筑护坡防水墙，长约4000米，以消除水患；同时，全面翻修民族路并新辟几条横路，交通大为改善。集家嘴河边设有到汉阳南岸嘴的轮渡，客运量日均2万多人次，节假日高达3万多人次。

以前，笔者没见过清朝集家嘴码头的照片，而龙王庙码头堪称明星码头，留下来的照片、明信片最多。

2023年出版的《武汉晚清影像——比利时医生镜头中的1898—1908》中，有多张菲利普·斯普鲁伊特医生110多年前拍摄的集家嘴码头照片，码头上一片繁忙的景象：划子云集接送乘客，划子曾是武汉三镇的主要交通工具；台阶上成群结队的人挑水上下，那是“挑水吃”的时代。



看到这张照片让人想起了清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中的两首诗，似乎可以为之作注解：

下路人家屋紧排，生人到此向难猜。
但随水桶空挑者，直到河边是正街。
五文便许大江过，两个青钱即渡河。
去桨来帆纷似蚁，此间第一渡船多。

所谓“下路”，即正街汉水下游沈家庙至集稼咀一带。1635年汉口筑长堤（袁公堤）后，此处日益繁华，人烟稠密小巷子多，行人至此容易迷失方向。但正像叶调元为自己竹枝词作注所言：下路人烟稠密，巷道繁多，四面皆屋，容易迷途。但随空水担走，便得正街。此正街乃集稼咀正街，今汉正街一段。挑水要去河边码头，码头有几十米石砌的台阶，水涨水落都可以取水。有挑水自家用的，也有以此谋生的水夫，“祈雨群儿戴柳条，大街抬着狗兄跑。若逢卖水人经过，水桶掀翻再去挑”。

去汉阳“两个青钱即渡河”，习惯称汉江为“汉水”“襄河”“小河”；去武昌“五文便许大江过”，称长江为“大江”。那时还有沿江河行驶的划子，去江汉关、硚口均

可以坐划子，溯江而上（高头）的收费贵些，顺江而下（底下）的便宜点。

20世纪初，一本英国杂志登载汉口水上繁忙景象的照片，河边三层楼处为集家嘴码头，河中木划唱主角，除了载人过河，还是水上贸易载体。英国人惊讶地评论“举世翘楚的小划子”：汉口忙碌的中国人用他们的船快速航行于扬子江上。汉口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拥有巨大的贸易量，主要是茶叶。城市临近茶叶、棉花、丝绸和大米的主产区，扬子江让汉口能便利和便宜的通过水运把货物运到上海，一条海上贸易中心直达欧洲。汉口拥有举世翘楚的小划子、舢板、平底帆船，许多人在岸上没有房子，生活在船上

集家嘴正街

比利时医生拍摄的两张照片，可以看到坐划子上岸后，左边有一栅栏通往集家嘴正街即汉正街的下段；水夫或居民在汉水取水后，通过栅栏前往集家嘴正街，送往商铺或居家。





上图为一张美国地质工程师克拉普民国初年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老胡开文贞记”出现在1926年出版的《汉口商业一览》第47页“胡开文总号又贞记集稼嘴正街”，电线杆竖在街旁，照片左边亦有栅栏(铁门)。



上图为30年代日本人拍的照片“旧汉口镇集家街之码头”，人力车守候在码头上岸处等待客人，照片中的小亭子为人力车的

站点，解放后为三轮车的站点。《1959年3月武汉三轮车一览表》中，沿江(河)大道干线站点有永宁巷、集家嘴、红十字会医院、四官殿、港十三码头、民生路江边、武汉关、南京路江边、车站路江边、粤汉码头、黄浦路江边，共有11个三轮车站点。

1961年清明节，我随舅舅去汉阳扁担山给外祖父上坟，主要靠走路和坐船。我家住民意一路大陆里，早上步行到中山大道六渡桥坐2路电车到硃口终点站，下车后步行到河边，坐划子过河到汉阳琴断口。上岸后，沿着小路、田埂步行到扁担山。其时，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沿途大人们眉飞色舞谈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邱钟惠，还有湖北的胡道本等运动员在世锦赛上的表现，忘记了走路的疲劳。祭拜完后下山，直接步行到河边，坐划子顺水到集家嘴上岸，走民族路到民主一街回家。

时光荏苒，汉江上一座又一座大桥兴建，“五文便许大江过，两个青钱即渡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晴川桥就建在集家嘴与南岸嘴之间，你可以漫步桥上，看两江交汇大江东去。值得一提的是，武汉轮渡仍有集家嘴码头至汉阳门码头的航线，伫立甲板，可观两江四岸风景。

老集家嘴码头，已成为武汉人的历史记忆。

田联中，武汉市交通科学研究所退休干部

那个传说蛮多的“猫子”老师

◇ 周希正

江汉大学音乐学院，是我歌唱事业的起点，也是我引以为傲的艺术之苑，一草一木都融在人生经历中，成了我抹不去的记忆。

1993年，我从江大音乐学院毕业10年后，母校调我回声乐系任教。临别之时请同仁相聚话别，大家纷纷谈到，我毕业后调入江大音乐学院的老师中，有个“猫子”老师专业蛮厉害，她是武汉音乐学院前身中南音专著名“小太阳班”的尖子。有的同仁甚至调侃：“你到江大一定要先去拜拜‘猫子’老师的码头，她可是江大的‘声乐一姐’。”

的确，不久前我也在武汉电视台的文化节目中，看到“猫子”老师给市民普及声乐，引经据典，深入浅出。人未见，闻其声，

观其影，江大声乐权威“猫子”老师，让我加入母校教学团队的期盼更为迫切。

我们开始共事，逐渐感到“猫子”老师造诣深厚，对声乐艺术执着纯粹，痴迷其中如同一个生活在艺术语境中的人。声乐圈关于她的传说版本很多，回忆起来颇能反映她的风采。

那个高冷的“猫子”

声乐教学独立性很强，美声唱法老师一生探究西洋咏叹调，在一般人眼里，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当初回母校任教心是忐忑的，熟悉的环境，不同的身份，各路“神仙”会不会接纳我？



2011年，著名声乐教育家周小燕（左）与朱善梅（中）及弟子喻凤

相处一段，感觉“神仙”一个个客客气气，又好像总在观察和试探，特别是与“猫子”老师基本没有交流。她只关注歌唱，给人以高冷的印象。

上班，我有早到的习惯，可有人比我更早。我早到是抓紧时间自己练声，她早到是抓紧时间为学生练声。她，就是“猫子”老师。我们没有语言交流，只有歌声在琴房交汇。我听得懂“猫子”老师给予学生什么，“猫子”老师也听得懂我在摸索什么。“猫子”老师的敬业精神，让我发自内心敬重，每次与她照面都会投以尊重的目光，她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友善。就这样，我们用声乐老师特殊的交流方式，开始熟悉起来。

声乐教师的教学成果全靠舞台呈现，无论你声乐艺术的造诣有多深，学生的演唱效果直接反映你的教学能力。第一个期末考试，对于我这个教学新手来说，不是考学生而是考老师。班上清一色男生，基本是没有上过舞台的郊县子弟，每一个上台都紧张的不得了。我也紧张，但不能流露出来，坐在监考席上微笑，装出随意的样子，力图把考场紧张的氛围冲淡，为弟子们保驾护航。弟

子们也给力，尽管舞台上表现生涩很明显，但紧张下认真的样子还是打动了考官。考试一结束，“猫子”老师就激动地冲上舞台，一反刚才的严肃，和蔼可亲地拍着我弟子徐勇的脸：“乖乖，你唱的太好了，形象也好……小周，他们进步蛮大哦。”

更让我感动的是，“猫子”老师得知我仍在跟声乐教育家杨金岚老师上声乐课，提出也想去听课。啊，已是功成名就的教授，如此放低身段自我提升，直到今天仍深深打动着我。

以后，“猫子”老师风雨无阻跨江过河，早早来到武汉音乐学院杨金岚老师家。杨金岚老师每次给我上完课，都会让“猫子”老师提提意见。她们打破声乐教学“神仙”之间互不来往交流的积习，将声乐演唱作为一门学术来切磋研究，融入场景感的传帮带，让我从声乐演唱舞台快速过渡到声乐教学讲台。

这一段初为人师的艺术学习过程，有良师同行，实在是人生幸事。

那个打学生的“猫子”

声乐教学形式抽象性很强，歌唱的呼吸、共鸣、通道、流动、挡气等专业术语的理解和运用，全靠老师教学语言的启发，用“君子动口不动手”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然而，“猫子”老师的教学却“动手”了，并被好事者演绎成“动手打学生”。在那个没有自媒体、微信、抖音的年代，传言从江大到华师到武音，甚至我去秭归演出，同行的歌唱演员也拿此调侃江大的声乐教学。对这样不负责任的流言，我理所当然给予回怼。

“猫子”老师的声乐教学，将抽象过程具体化，确实突破了“不动手”的常规，而且还是“上下左右开弓”，我见过。一天，在密密麻麻练声曲中，一阵阵甜美松弛的歌声，从“猫子”老师那个破琴房飘出。我被吸引推门而入，只见她满头大汗半蹲马步，左手弹琴，右手推在学生刘季春的横隔膜位置，为之示范高音发声。

美好的声音，是要付出强大的体力劳动啊！“猫子”老师年近五旬，这样忘我的教学态度给我无形影响，很庆幸遇到这样的良师益友。后来，刘季春成为武汉歌舞剧院独唱演员，每次和我同台演出，都会让我代问候她的恩师。

“猫子”老师作为教学经验丰富的名师，弟子中优秀人才很多，但她从不居功自傲，更不怕“砸牌子”。江大学生的音乐素质，肯定不能和华师、武音相提并论，这是不争的事实。不少声乐老师对天赋一般的学生都会“摆烂”，得过且过。某位号称世界前五十年强的声乐老师，就在抖音上公开说，教声乐基础差的学生等于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然而，“猫子”老师对这样的学生，总在琢磨如何通过“动手”

示范，以弥补其先天不足。每天早晨的舞蹈教室，都有一群“没有天赋的学生”环绕她身旁，雏鹰学飞一般练习歌唱。在讲求功利的浮躁风气中，一位大学老师能默默“动手”让学生掌握发声部位，如医生对病人触诊一样难能可贵。

在我看来，“动手”是一般老师达不到的境界，“猫子”老师的无私付出赢得学生的尊敬，不少学生叫她“妈妈！”

那个抢学生的“猫子”

“猫子”老师的辛勤耕耘，换来弟子们专业上的进步，每次考试都很亮眼，在准确性和完整性上可圈可点，特别在歌唱语言的规范性上都很讲究。我作为声乐教师，对其中的艰辛和难度深有感受。

歌唱是一门综合艺术，好的声音不仅仅有一副好嗓子就行，而是在歌声中要唱出情感，要靠歌唱语言去传达，字正腔圆是声乐训练的重要内容。当时，江大的生源限于武汉周边的三郊（江夏、蔡甸、汉南）两县（黄陂、新洲），其方言区已跨越到西南官话和江淮方言领域，尤其是黄陂、新洲两县的学生乡音很重。

“猫子”老师对歌唱语言很有造诣，对歌唱咬字要求很严格。面对乡音浓重的方言，让学生在标准的四声中表情达意，这个教学的难度我领教过，太需要耐心和



2002年，朱善梅（二排右四）与应届毕业生

爱心。一次课堂上，她为新洲籍学生准备考试曲目《送别》，第一句“送君送到大路旁”中的“君”，新洲方言发音是“淳”。在对学生矫正好多次后，她仍然很有耐心地说“不急、听我再示范一次”，然后故意模仿学生发音“送淳送到大路旁”，用手拍拍学生的脸，“乖乖，你把我带到新洲株城了”，使之通过对比找到了症结。另一次，黄陂籍学生唱“乌母音”中的“如”时牙关紧咬，她上前对学生说：“来，你张开嘴，可以咬我的手指吗？牙关要松开。”

这些，都是我观摩“猫子”老师声乐课时看到的画面，她的辛苦和乐趣闪现在温馨生动的教学互动中。不知何时，江湖传出她上课打学生脸、抠学生嘴巴不说，还编排出她的学生之所以优秀是抢别人的好学生。

我在江大工作几年中，“猫子”老师和声乐系的前辈，在挑选学生的程序上真是表率，从来礼让在先没红过脸。在江大，“猫子”老师最喜欢的男高音学生余伟最冒尖，但她认为“男高音教男高音”有天然优势，作为资深名师让出她最好的学生，也成全了我和余伟的“师生缘”。

记得，“猫子”老师在挑选学生时给我说的话：“小周，莫在乎学生的好和不好，年轻时多教基础薄弱的学生，你会收获很多教学经验。教学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原有基础上有进步，目的就达到了。”话很简单，却富有哲理，成就了我声乐教学的风格和理念。可不是吗，我在德国唱歌剧的弟子李浩回来时说了一句话：“歌唱的语言是能够登上国际歌剧舞台的根基，感谢老师收下当初其他老师看不上的我。”这是江大声乐文化的传承，是我在江大工作期间收到的最珍贵礼物，也是我后来在华师职业生涯中积累的宝贵财富。

人们常说，在人生前行的路上得一良师同行，是一件幸福的事。与“猫子”老师共事，她的人品艺术品真实得可见可感，一直影响着我的前行。

回忆了半天，“猫子”老师是谁呀？

2023年，我已离开江大到华师任教20多年，受省文化和旅游厅之邀去鄂西评审一个项目，同行的剧作家宋西庭老师听说我有江大的经历，立马用他的天沔方言问：

“你认识‘猫子’吗？她还好吧？”然后就打开了话匣子：“她是我的舞台搭档，当年我演李玉和、她演李铁梅，我个子高、她个子矮，有一个铁梅为李玉和戴围巾的动作，我低下头方便她，结果帽子滚到台下。‘猫子’是我们剧团的业务骨干，她的能力蛮强喔。当年她的教学很有一套，培养了许多名演员，学生们怕她更服她。她越喜欢你，越对你要求严格，后来到了江大，她是不是还是这样啊？”

宋老师绘声绘色讲述，最后透了底：她那长得精致圆圆的脸似喵喵，我们就叫她“猫子”。

“猫子”老师——著名声乐教授朱善梅，江大音乐学院的一张名片。如今，朱善梅教授早已荣休，学院换了一茬又一茬学生，但“猫子”老师的传说，蕴含了那一代声乐园丁的风采，不该随风而逝吧？

周希正，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